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口才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前 言

如今已出版了许多研究邓小平的书，研究的角度也相当广泛。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从口才学的角度来论述并研究邓小平。本书的目的就要是弥补这一缺憾。

我们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写过许多精采的文章，讲过许多精采的话；这些文章和讲话不仅充满思想的闪光，也充满口才的闪光；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位卓越的口才大师，当然也是思想大师。

他的许多话早已在神州大地成为家喻户晓的警句，如今更是深入到我们的思想和灵魂。

如：“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杀出一条血路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国两制，共同开发。”“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上海是我们的王牌”。

以上这些“醒世恒言”或要言妙道还可以不停地写下去……但暂时就写到这里吧，从中我们已感到他口才艺术的魅力。

读者即将读到的这本书《邓小平口才》共分八大类：经济口才、政治口才、外交口才、统战口才、军事口才、文教口才、科学口才、人生·哲理口才。我们从这八大类中不仅可以欣赏到邓小平口才的朴实、含蓄、诙谐、幽默，同时还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思想和哲理。

邓小平的口才虽然不像毛泽东那样神采飞扬，但也相当生动、富有内在激情、有一种静水流深的大口才家风范。这一特点也反映出他的性格。

邓小平一贯话不多，从不喜欢罗嗦。他的女儿毛毛描述他的父亲说：“我的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而正是邓小平的这一性格特征才铸就了邓小平的口才风范。

如果说毛泽东的口才表现了强烈的诗性的一面，那么邓小平的口才则表现了坚实的理性的一面，他们两人是双峰并峙、各具风采但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因此，我们在编选了《毛泽东口才》之后，又为读者迅速地奉献出《邓小平口才》。两种口才，两种风格。犹如矛和盾这两个方面，他们各自代表着各自的口才极峰，交相辉映、朗照乾坤。

最后让我们聚精会神打开此书，跟随邓小平的口才进入一个美妙的世界吧！

1996年10月24日于成都

邓小平口才

一、经济口才

1. “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期间，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提出了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邓小平顺势谈起了他办特区的设想。接着，他说出了一席惊天动地的话来：“可以划一块地方，叫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二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席话不仅显示出他思想的深刻，而且也显示他口才的魅力，用语十分坚定有力。仅用“杀出一条血路来！”就给人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力量。

很快，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1979年6月6日、6月9日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委的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8月26日，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从此，深圳特区成了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也实现了邓小平的总体战略构思，即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这一经济策略。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石破天惊的口才“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感召下，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长征。

血路开始杀出来了！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满怀激情视察了深圳特区。他深情地说道：“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这几句平凡的话炮轰了邓小平内心多少殷切的希望与热情。

邓小平满怀感慨他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

接着他侃侃而论道：“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在邓小平的心中，特区是一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

血路终于杀出来了！杀出了一条通向世界经济大舞台的血路！

1985年夏天8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竹入义胜及其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13次访华代表团时也谈到了经济特区问题。

邓小平说：“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怀疑，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的判断，建立经济特区的话是不是改变了。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

邓小平充满信心他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在

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走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竹入义胜说：“你的话非常明确，全世界的人听了以后都会放心的。”

果不其然，深圳在短短的几年腾飞了，而且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样板。80年代人们争相去深圳取经，这一切犹如70年代去大寨取经那样。

继1984年邓小平作了第一次深圳之行后，又于1992年作了第二次深圳之行。在后一次深圳之行期间，邓小平发表了震撼国内国外的“南巡讲话”。其中最为有名的话就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邓小平在如此高龄还能说出这番如此有青春朝气的话，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他头脑清晰、思路敏捷，口才在稳重申兼具一股激情，表现出一个真正伟大革命家的胸襟与胆识，的确难能可贵，不觉使人还想起曹孟德的几句名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口才、思想和激情与古今中外大英雄的心是相通的。尤其是邓小平这句“杀出一条血路来！”定当成为这个时代的旷世名言以及所有经济战线上的先锋战士的共同口号。

2. “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毛泽东曾说过：邓小平，人才难得。的确如此，邓小平不但政治觉悟高，而且在经济建设方面更是一个卓越的人才。现在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他在战争年代就曾表现出过人的经济才华。

1943年7月2日，邓小平曾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听到了他最早的有关经济建设的声音。

邓小平说道：

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整整的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战的负担。如人所共知的，我们同敌人进行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务的斗争，大大地发扬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还有加入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在这段论述中，邓小平运用了他极好的经济口才。他一上来先谈困难，然后话锋一转，再来一个设问句，也就是我们克服并战胜

了困难，那么秘诀何在呢？这一问句一下就把读者的心勾起来了。这时，邓小平再从容不迫地款款道来。他谈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毛泽东正确的指导原则，另一个就是坚持了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接着，他强调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然后再转谈“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

其中，他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至今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这句话看似平凡，却力重千钧。邓小平以如此肯定的语气说出这句话，可见他本人对这句话的分量的看重。毛泽东后来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一切问题都好办了。

邓小平一下就抓到了经济建设的核心，真可以说是直接点中了要害。

接着、邓小平层层推进，又指出：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

邓小平还说：“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

另外，邓小平说话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实在，有时甚至很具体，决不空泛。他在谈到发展生产时，讲得也十分细致，他说：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犁地、选种、下种、选苗、锄草、夏收、秋收，还要适时地积肥、施肥（第二年的肥料头一年六月就要开始准备）——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

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抬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

邓小平不仅对于农业生产非常熟悉，而且在那时，他已注意并提到了“税收贸易政策”的关键是“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同时，还强调了“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

最后，邓小平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

3. 邓小平一席话说得毛泽东 满意地点了点头

1931年8月，邓小平奉命从闽西赶到瑞金，并走马上任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

当时由于肃反扩大化，革命力量尤其是干部队伍遭到严重摧残。加紧培养和壮大革命队伍成为当时一项迫切的任务。这时，邓小平在县城善社举办了一期有50多人参加的干部培训班，亲自授课，为苏维埃的政权建设培训人才。

邓小平当时十分喜欢瑞金群众流传的一句谚语：“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蕃薯。”

他要求干部要了解群众的愿望，切实为群众解决困难。

邓小平的工作搞得十分火红，经济建设亦蒸蒸日上。

1931年9月28日黄昏，一队快马由宁都方向疾驰而来，骑兵下马向邓小平报告：毛泽东、朱德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机关即刻就到。

叶坪村外，毛泽东、朱德、项英、陈毅、王稼祥等与前来迎接的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等见面了。久别重逢，一片欢腾。

是夜，村东大樟树底下的一幢二层楼房里，灯火明亮。毛泽东等人围坐在一起，听取曾山、邓小平等同志的汇报。

邓小平异常兴奋，高兴地侃侃而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邓小平的汇报，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如期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代表工农大众的全国性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诞生了！

瑞金县城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更名为“瑞京”，瑞金县划为中央直属县。年仅27岁的邓小平挑起了中央直属县县委书记的重任。中央政府建都瑞金，住的吃的用的等等都要增加，这给原本就很薄弱的瑞金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眼下必须将瑞金的生产建设进一步搞上去。

“一苏”大会一结束，邓小平把县委、县苏干部召集起来开会，郑重地和大家商量道：“我们要发动广大的劳苦群众，特别是党团员，积极带头行动起来，出谋策划，多想办法，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又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也不能让人民群众挨饿受冻。”

邓小平这番口才可谓面面俱到了，而且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确是一下就抓住了要害。

邓小平在瑞金时，住与老百姓一样的民房，有时甚至住祠堂、庙宇。他在瑞金10个多月，先后迁居五六次。他常穿粗布中山装，吃的与大家一样。他吃红薯从来不剥皮，还风趣他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邓小平所做的这一切，以及他那风趣幽默的口才都是为了厉行节约，支持革命战争。他不仅自己带头节衣缩食，而且还号召全县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都要节省募捐，支援前方打仗。

4. 不管多大的老虎屁股都要摸

邓小平的谈吐有时是冷静的，平稳的；但有时候又显得激烈而尖锐。在某些场合，邓小平说话直言不讳，开门见山，一语道破，言辞既大胆又个性鲜明，并充满了坚决的力度。

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中央工作，面对“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混乱局面，他决定在全国实行整顿。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作了一个讲话，他说：“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当然还不能说是懒的、散的。软，就要加强一下。各个工厂企业领导班子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散，与闹派性有关。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条件是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冶金部作战就没有力量嘛。有些公司、钢厂的领导班子作战也没有力量。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不光是冶金部，各个公司、厂矿、车间的领导班子，包括职能机构，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邓小平的这番谈话真是干脆利落，切中要害。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钢铁生产搞不好的原因。随后，他针对当时社会上“派性”盛行的现象又说：“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可是

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我们要相信群众，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各地经验证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拥护中央精神的，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人反对。今年三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育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

“现在还在那里闹派性的是少数人。其中，有的是敌人，他们利用派性来闹事；有的是为了争个人名利而打派仗；有的是打了几年派仗，被派性迷住了心窍。根据铁道部门的经验，徐州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在同派性作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也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徐州闹得那么厉害，最后被打击的只有三个人。绝大多数人，包括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都可以挽救过来。所以，实际搞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

邓小平一心想把国民经济尽快搞上去，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因此，对

于破坏安定和生产的闹派性的人他是深恶痛绝的。在此他以短促有力的语言对他们发起了凌厉的进攻。

邓小平在全国大搞整顿之事使“四人帮”大为不满，他们对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大肆的诬蔑和诽谤，称邓小平为“还乡团头子”，说他“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面对“四人帮”的进攻，邓小平毫无畏惧，他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多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让他们骂好了。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1975年九十月间，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又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

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

邓小平的这番话一方面是号召人们大胆地搞整顿，同时也是针对“四人帮”及其爪牙对他的攻击的。当时，正值中国政坛乌云密布之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年老多病，“四人帮”气焰嚣张，得势横行，邓小平的这番话讲得可谓铿锵有力，胆识超人，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势。他不仅敢去摸令人望而生畏的老虎屁股，而且什么样的老虎屁股都敢摸。六十岁的老虎屁股敢摸，四十岁的老虎屁股敢摸，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敢摸，而且，一摸就见效了，这真是极有勇气的说法，也是极风趣生动的说法。横生的妙趣和惊人的胆识相结合，显示出邓小平出类拔萃的口才。

5. 一语震动全局

1975年3月初，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独具特色的见面方式和撼动人心的话语，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会议开始那天，国务院主管工业的领导干部和各省、市、区的工业书记聚集在会议厅里。听说邓小平要参加会议并讲话，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特别是那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战斗，工作过的干部，更是对这位老首长重新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感到由衷的喜悦。一些人禁不住喜上眉梢，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一些人不时地看手表，左顾右盼地环视着，希望快一点见到这位多年来见的老领导。

离开会的时间还差几分钟，忽然一个边门打开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议厅。他的身材并不高，但是体阔肩宽，步伐稳健，显得刚毅有力。他神态安详地环顾四周，半个世纪斗争风雨的磨炼，使他既不露喜，也不显忧，对于人们惊喜的目光和热烈的问候，他只报以含蓄的点头和瞬间的凝视。

一会儿，几个省、市领导走上前来，满面笑容地想与邓小平握手，邓小平却迅速地举起右手在空中摇了摇，向大家说：

“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这句话真是开诚布公，讲得直率。它一下子把邓小平对乱世的忧虑点了出来，全场刹时鸦雀无声了。那些原本想与邓小平握手的干部面面相觑，僵僵地怔住了。

邓小平走近大家，站住脚，目光从会场扫过。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这种对1975年初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在场的大多数工业书记心中共有的认识，但是用来代替见面的礼节，却是在场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

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不紧不慢地划着火柴，吸燃一支烟。开口说道：“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向左右望着，以不容反驳的力度大声说：

“全党全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谈话开门见山，直戳要害，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其振兴民族经济的急切心情真是溢于言表，让人感奋。随后，他吸了口烟又说：“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他从农业谈到工业，然后说：“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接着，他讲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需要采取的措施。他一条一条地讲，声音由低渐高，忽然，他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茶水溅了出来：“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

他停顿了一下。稍顷，接着讲：“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

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

他越讲，神情越严肃：

“另外一种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

他的声音严厉，微显颤动。特别是讲到少数坏人“利用派性混水摸鱼”、“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时，言辞铿锵，句句如锤。全场悄无声息。

他疾言厉色地继续说：“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亦了。”

他不能平静，怒目四顾，心底的火利剑般地从眼中射出来，仿佛那些闹派性的人就在角落里躲着。

最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他以反问的方式结束了讲话。

6. “骨头”和“肉”

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中谈了过去（即前一个阶段）我们干革命，而从今以后就是搞建设了。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了建设工作并非易事，要下苦功、大力去干。同时，邓小平还谈到了勤俭建国这个大问题。

接下来，邓小平就西安的城建问题，为我们娓娓道出“骨头”与“肉”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说：城市规划中的问题也不少。规划是必需的，不规划是不妥当的，问题是怎样规划。规划也有指导思想问题，规划得不好会造成大的浪费。据说现在西安市城市规划的图纸上已摆得满满的，实际上里边空的地方很多，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填起来。我看到一些纱厂和二机部的一些厂子，每一座厂房相隔很远，厂内占地很大，建设要花很多的钱。

在“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中，对解决“肉”的问题也是求新求大。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这是事实。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妥当，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应当着重指出，过去在这方面花的钱并不少，就是用得不适当，今后我们要花更少的钱解决更多的问题。在中央来说，是对于“肉”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恐怕在地方来说，对于钱用得不适当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次我看了很多地方，有的花钱多没有解决问题。如果不客气他说，我们在兰州的印象比在西安好。在兰州我看到很多简易的东西，戏院还可以放电影，座位也不错，这样的戏院盖起来只花十万元，有的花钱更少就解决问题。事实上，那些大的漂亮的少盖一个，就可以盖很多个小的简易的，分布也会更匀称一些。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现在已经感到搞多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了。我们如果本着这样的精神，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把钱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如修下水道等。西安的电影院戏院并不少，但是在工业区一个也没有，要看戏的人找不到戏院，有戏院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去看戏，这个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现在不是说交通困难吗，如果我们的城市建设布局适当，在人多的地方多建一些简易的商店、理发馆等，交通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有群众的地方就要修学校，少建一些大型的校舍，就可以多建一些简易的学校。总之，这些都是关系到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问题，也是处理“骨头”和“肉”的关系的指导思想问题。

邓小平在这里以既生动又有说服力的口才为我们道出了经济工作中的辩证法，即“骨头”和“肉”的关系。

“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

“骨头”和“肉”在这里是一种形象说法，而形象思维的运用是口才艺术中非常重要的方法。当然邓小平是深懂此法的。

7. “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

1975年的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发出了全面整顿的“排炮”，这些“排炮”犹如阵阵春雷，滚过祖国的大地。众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产生出一种自“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欢畅之感。

尤其在经济战线上，邓小平于同年8月3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邓小平的口才有一股春意，一股敢字当头的闯劲，他劈头说道：“我要讲几句，还是些老话”。

接着他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多数工厂企业已经解决了，还有少数没有解决。“老大难”单位，无非是这么个问题。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有的人就是一个怕字。过去怕，还有点道理，不能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怕也不对，但是还可以原谅，因为有当时的情况。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怕就只能怪自己，怪自己革命意志衰退，怪自己革命干劲差，只能得出这个结论。怕字当头，不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这件事不要拖，特别是省里管工业的书记要注意。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五十岁的、四十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本厂可以找、本厂有困难，外厂也可以找，本地区也可以找，哪里会找不到人！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要好好培养。

邓小平的口才依然十分凌厉，开门见山就点出一个“敢”字，并提出要以这个字来建领导班子。

接下来，他又谈了第二个问题，特别是对国防工业的产品问题，他说：“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为什么呢？邓小平一语将其点破：“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同时他还谈了对科技人员的尊重问题。

最后，邓小平话锋一转，以他的平常心在细微处见大道理。

他说：“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如钢铁工人劳动那样重，而蔬菜少、肉类缺，基本条件都保证不了，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地去研究解决。这一点在工业多的城市要特别注意。有些干部不是喜欢养鸡、养兔、养鸭吗？如果把自己关心自己的这个积极性转到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来，我想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还有在山区的三线工厂，那里的商业工作也要改进。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的工人反映，蔬菜少，肉类缺。不仅是四川，还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缺乏副食品的问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重庆附近，可以专门划出一部分地种菜，生产的蔬菜首先供应工厂，还可以供应市民。工人有点菜吃，有点肉吃，农民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对于改善工农关系也有好处。我们正在考虑，是不是调点粮食给一些城市的郊区养点猪，比如调五亿斤粮食，

养五百万头猪。这些粮食不是全国到处分配，而是搞几个点，专粮专用。甚至还可以考虑用现代化的办法搞些养鸡场。这个问题要研究。最主要的是养猪。发展养猪，既可以使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又可以增加肥料，增产粮食。现在搞重体力劳动还很艰苦，不搞好职工生活不行。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活。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

国计民生是自古以来的治国者都必须认真对待的，连曾国藩也提出过“书、蔬、鱼、猪”这四个字。邓小平这样的治国大才当然更明白此中的道理，由此才在这里提出蔬菜、猪肉之类问题。这些东西并非小道，而是大道。邓小平在此以朴素的口才为我们娓娓道来，令人倍感亲切。

而且他在8月18日《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这次谈话中还再次提到：“城市可以帮助农村搞一些机械化的养鸡场、养猪场，这一方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改善城市的副食品供应。要是工人没有菜吃，没有肉吃，工业怎么能搞得”好”？

邓小平说话的确是能一下子就说到事物的本质上。

8. “继续批邓，一直批到真理出来！”

邓小平不但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且也具有十分高超的口才艺术。他说话有时无比犀利，有时无比含蓄，有时无比生动，有时还无比幽默。他对口才艺术中的各种技巧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运用得相当自如。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他一次在广大人民中间说的一句令人回味无穷的话语吧。

1976年下半年，当时毛泽东已逝世，“四人帮”面临倒台之际，社会上亦到处可见“批邓”的标语口号。这时邓小平来到了广州市，由许世友亲自派了几十名彪悍的便衣负责保护。

邓小平来到一个肉菜市场，他把帽沿压得低低的，把眉毛也给遮住了，所以没人认得出他。他来到一处国营的蔬菜摊前，只见摊档上的菜全是青黄色的，他便问这蔬菜部的职工说：“怎么卖这些黄叶菜？”

这职工没想到是邓小平，便咬牙切齿他说：“还说黄叶菜？这样下去，树叶也无得食！”

邓小平一听，一言不发就走了。

他在一个肉铺前站住，往柜台上一看，案板上只有几斤老母猪肉，但后面却足足排了成百人，售货员小心奕奕地把小片小片猪肉按票卖给市民。邓小平问售货员：“这么几斤猪肉，排了这百多人，每人能有多少？后面的岂非得吃？”

售货员一听，苦笑道：“你没看见连母猪也杀来卖了么！现在政府哪还管我们有没有肉吃！”

邓小平无言以对，正想走开，突然一阵风吹来，把他的帽子吹掉了，排队的市民一看，哈！这不是邓小平吗？于是“邓小平！”“快来看邓小平！”“邓小平还在！”的声音吵了起来，市民纷纷涌了上来。

负责保护邓小平的便衣大吃一惊，连忙要邓小平迅速离场。但邓小平却笑着对便衣说：“我没有干对不起他们的事，干嘛要溜走？”他索性停了下来。

群众把邓小平团团围住了，许多人都知道邓小平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便向他鼓起掌来，最后，更有人提议要他讲几句什么。邓小平想了想说：“继续批邓，一直批到真理出来！”说完，他就大踏步地走了。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继续批邓，一直批到真理出来！”可谓力若千钧，同时也为广大民众传达出一种坚定的信心，即真理在手，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9. “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1961年，“共产风”的势头刮得很猛，但实际上是违背了实际情况，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这一年的4月15日，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县北小营召开的田上犂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支书，生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上，反复询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好吃，相反地却违心地找出一些吃食堂也不错的理由。

其实，当时公共食堂继续下去已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境地。

随邓小平来视察的卓琳由于在上犂村孙旺家住了一个星期，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就告诉邓小平说：“上犂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

邓小平同志听后很高兴他说：“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单产1959年达到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你们的好经验应该总结一下，推广下去。”他还着重指出：“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同志在牛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火，一片荒凉景象，只养着一头40斤左右的小猪。接着在深入农户访问时，看到一位老大娘喂养羊，猪圈却空着。他问老大娘：“您养羊，为什么不养猪？”老大娘说：“还养猪，人还没吃的呢！”邓小平同志经过深入的了解考察，觉得问题严重，因而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明确表态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在县委书记汇报当前工作时小平同志指示：“现在食堂是过渡时期，可以自由一下，不愿意在食堂入伙的就可以不摊工分了，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对不入食堂的户怎样分配的问题。”在公社、管理区、大队干部座谈会上，一些干部反映说，有些群众愿意办农忙季节食堂，冬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邓小平同志说：“这样也可以，一年农忙六个月吃公共食堂，农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还可以解决社员冬天烧炕取暖的问题，能节省一些煤。”

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像暖流，温暖了干部群众的心，他说出了干部群众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仅上犂村，第二天就有250多户退出了食堂，余下的也仅继续了两个月。

邓小平办事实事求是，心里只装着人民。正因为如此，他的口才才十分具有折服力，而且，说出的活不仅非凡同时也很自信。

他在顺义期间，还十分关心乡村的集市贸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

他以坚定的口气说：“不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来卖，把集市贸易繁荣起来。市场上的物品增多，市场也就活跃了，社会生活也就方便多了。农民的收入增加，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一稳定，人心也就安定，政治影响也好。”

在谈到手工业没依靠、原料没人供、产品没人给销等问题时，邓小平同

志指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把县和基层的供销社恢复建立起来。县供销社搞几个人，只搞供销，不搞商店，有些人可以归队。农村基层供销社先把机构搞起来，再建立各种制度和章程。供销社的首要任务是组织生产，要把手工业专管起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抓。柳条现在就可以插，把现在的苇地经营好，想方设法解决原料问题。你们不能培植荆条，可以搞柳条，可以和别处换。你们要有这些人吃这个饭，干这个事”。对手工业人员，“要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组织好、有人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搞原料、搞销路，定出合理价格。要对他们不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他还指出：“县供销社和商业系统，要认真研究怎样管理自由市场，调剂商品价格问题”。

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发展家庭副业问题：“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你们县是一个传统的养猪县、社员喜欢养猪，而且有丰富的经验。若是把这个传统丢了很可惜。一头猪不仅能赚20多元钱，肥料还能养二亩地，不施化肥，也能增产，社会效益就高了。你们县土地、水利条件比较好，就是肥料问题制约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多养猪、养好猪，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粮食生产也搞上去了，……，你们要抓住春天这个大好时机，尽快地把养猪事业发展起来，既满足了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件好事。”

的确要心系民众，说话才能句句实在，妙语如珠。邓小平的一颗平常心非常了解人民的疾苦，因此他的口才才能够在平常中见出不平常的东西。

10. “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

邓小平同志在几个座谈会上都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即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的责任制。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当然，定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就会有奔头，就拼命去干了。”

在谈到分配问题时，邓小平同志说：“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评工记分必须搞得严密一些。死分死记，死分活记都不能很好地体现同工同酬，还是初级社时的老办法。比如二等劳动力干一等劳动力的活，还记二等工分，这就存在着平均主义，就会打击二等劳动力的积极性。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克服。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在讨论到怎样确定手工业人员的报酬时，邓小平同志指出：“手工业人员有技术，报酬低了会伤害他们的积极性，收入太多了农民不干。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以单独核算，可以作为一个大核算单位中的小核算单位。既照顾集体和大多数社员，又必须使他们多收入一些。在一个单位内，技术人员之间，也要实行定额包工、包件、包质量责任制，做到多劳多得，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他们就有奔头了。”在谈到拖拉机的管理时，也指出：“管理拖拉机站要像管理企业一样，采取一套管理工业企业的办法……拖拉机手的待遇应同企业工人待遇一样，要搞个工资加奖励制度……可以设两个奖，一个是个人奖，以一台机车为单位，就能调动起个人的积极性；另一个是集体奖，以小组为单位，……，各小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对生产也有好处。但要说明一点，本小组内的成员之间，必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在确定吃粮指标时，邓小平同志讲：“不要拉平，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活也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有差别，口粮的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农民就放心了，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灾害的积极性。”

邓小平治理经济的才干的确不同一般，而他的经济口才更是稳稳当当、滴水不漏。

11. “将来高跟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

1958年，邓小平同志来到贵州。

当时我国正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上缺乏经验，以致造成地方工业建设项目摊子大，战线长，投资规模膨胀，大大超过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承受能力，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城乡人民生活一度十分困难。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得不进行调整。此时，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来贵州视察工作的。

当贵州省委接到邓小平总书记要来贵州视察工作的通知后，便决定由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田维扬和当时担任省委常委、省政法委党组书记、副省长的吴实两人到清镇机场迎接总书记。1958年11月1日，邓总书记在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清镇机场。在乘车向贵阳方向行驶途中，总书记对吴实和田继扬说：“贵州光山多，要搞绿化。”还说：“公路太窄了，农村茅草房子太多，要改造。”

抵达贵阳，总书记只略事休息，就开始了视察工作。11月2日，他在花溪区视察时，针对当时存在的浮夸现象，向花溪区负责同志指出：“你们去年每人产值是否有160元呢？”小平同志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仔细询问：“房子怎么修？托儿所怎么办？娃娃怎么带？人家不愿入托儿所怎么办？”在田间又仔细询问农民伙食情况。

当时，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忽视多种经营。针对这一点，邓总书记于11月3日在遵义市湘江宾馆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对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等同志说：“要千方百计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铜县、铝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总要搞一些特色。农业还要规划种多少麻、烟等经济作物。”“为了发展多种经营，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小平同志特别注意到交通和能源。他强调：“交通要搞，每一个公社要通公路。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他一再指出：“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型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

人民公社化以后，社员的生活出现了单调和千篇一律的倾向。有鉴于此，小平同志于11月4日晚向遵义地委负责同志说：“将来高跟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的愿穿皮鞋，有的愿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该享受的应该享受。现在穷，问题还不大，富起来了就要求多样性。主活不仅是衣食住行，还有学习和文化娱乐，也是生活。”小平同志在视察过程中，已发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他提出每家喂一头猪，腌腊肉，并风趣他说：“不要把云贵川的腊肉搞失传了。”他还进一步说，农村茅草房子多了，生产队应实行互助，用二个冬、春的时间改造茅草房。他当即估算了一下，每户农民购玻璃及小五金只需一二元钱，就说：“可以办。”在遵义县大风暴人民公社，小平同志对那里的负责人说：“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这个自由。同样分三十元，有的愿意进馆子，有的愿储蓄起来买手表，

各人自由支配。这就是说，要不要点自由？毛主席向来主张个人要有点自由，大集体小自由。”这段话体现了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搞革命，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

邓小平以人为本，想人民之所想，而且非常具体、细心。正因如此，他说出的话才有可感、可亲的地方，有一种真诚的对生活的向往，有一种古老而淳朴的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经常描述的“国泰民安”的意境。

12. 新时代的号角：奔小康！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与前来我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举行会谈。在会谈中，大平首相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大平的这个问题，使邓小平陷入了沉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但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的提问启发了邓小平具体思考这个问题。他“想了一分钟”便讲了一段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话。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了，相应的，与国外的经济交往，包括发展贸易，前景就更加宽广了。

有人担心，如果中国那时候稍微富一点了，会不会在国际的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坦率他说，现在我们的对外贸易总额还不如台湾多。我们发展到台湾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不会对国际市场产生什么威胁，因为自己的需要多了。”

邓小平说的这番话讲得十分实在，十分贴切，它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具有的实事求是的风格。“小康”水准的提出看起来似乎不那么诱人，不那么令人兴奋，但它是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它包含着对中国几十年历史和国情的深思熟虑，是极为睿智的治国良言。小康目标经过党中央领导集体和理论界的研究，被认定是一个科学的设想，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它被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13. 邓小平妙语请荣毅仁“出山”

改革开放后，为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邓小平决定广纳贤才，人尽其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便与叶剑英商量，准备请荣毅仁出山，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原工商界人士。在座谈过程中，邓小平以亲切的语调、大胆创新的思维，讲了一番新鲜而精妙的话，力劝荣毅仁出山。邓小平说：

“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甩起来。

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邓小平这番话讲得十分诚恳，十分精当，它体现一种行动者的踏实，果决之风。在重要问题上，邓小平敢于打破陈规，敢于标新立异，很能鼓起人们的干劲，激起人们投身事业的热情。在邓小平的召唤下，63岁的荣毅仁感奋不已，他马上积极行动起来，开始为创办中信公司而奔走。197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终于成立了，从此中国大地又有了一个新行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信公司在经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看到中信公司的成就，邓小平又高兴他说：“中信和别人一起买了卫星，卫星已经放上天，很成功，……。发上去了就应该用嘛。”同时他还说：“他们在香港筹资，只要国内不提供担保，由他们搞去好了”。这是多么铿锵有力，自信

洒脱的语言呵！

14. “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

邓小平在 1979 年 10 月 4 日曾作过一篇重要讲话《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邓小平开门见山，劈头就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可见经济工作已到了刻不容缓，甚至夸张点说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的确，每个时期都各有各的工作重心。战争年代，打仗就压倒一切，建设年代，当然经济就压倒一切。

邓小平作为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领袖，更是急人民之所急，以人民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因此才如此紧迫地道出了经济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接下来，邓小平以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为我们定下了基本可行的目标。

邓小平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了，就能花多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现在我们力量不行。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这是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

接着，邓小平淡了要重视经济人才，发现并培养经济人才（其中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问题。

邓小平说：“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现在就要着手，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能够培养这样一批人才出来的。”

最后，邓小平还非常形象他说：人们对经济问题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看法，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把这些问题摆出来以后，梳几个辫子，权衡利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邓小平对经济问题的态度非常认真负责而且有一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因此他谈论到这方面的题目时，他的口才也显得实在可信。

15.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在这次会见中，宾主双方进行了一次十分精采的对话。

吉尼布：“我们想，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多少年来，对美国来说是关闭的，现在要这样高速度实现现代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挑战，确实像重新开展一场革命似的。”

邓小平：“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是荒谬的。”

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定了这个目标，要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头，靠具体的措施有力才能实现。现在人们怀疑，中国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目标？问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有什么根据。我们的根据可以讲有四条。

第一条，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

第二条，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我们现在有二百多万台机床，石油年产量超过一亿吨，煤炭超过了六亿吨，只有钢才三千多万吨。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第三条，我们相信中国人不笨。有十来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提倡解放思想，重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使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现在加强民主、发展民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发展民主，有人误解是提倡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林彪、‘四人帮’的时候才是搞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状况下不可能搞建设。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

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林彪、‘四人帮’把这种社会风气彻底破坏了。现在北京有个“西单墙”，就是那些不劳动的人，经常同事的人，‘四人帮’思想体系中中毒很深的人在那里活动，有的还搞特务活动。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尽管有错误，还是好意的，但是，里面实际上是‘四人帮’思想系统统治着。他们搞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种青年是极少数，但是能量比较大。我们对这些人采取严肃的态度，是为了教育年青一代。所以我们提出在加强民主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解放思想，也要恢复我们长期已有的好的社会风尚。我们说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有个条件，就是要实现安定团结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局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放松了科学研究和教育，这方面损失是很大的。我们要加强科学教育事业，要发现人才，很好地使用人才。归根到底，就是要发挥积极性，只要把人们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我们还是希望的。

第四条，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要花很大的精力处理“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许多问题。去年开始我们才真正地把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一定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还会不断地遇到困难。比如，我们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比如，我们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是人才不够。比如，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了，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我们参加国际合作，在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方面，也还要摸索经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障碍，这些困难，这些不足，我们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逐步克服的。这三两年内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绩，过几年面貌会看得更清楚。现在尽管人们还有怀疑，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这个事业能够成功的。

吉：“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那末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否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混乱，即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

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在这些方面我们改革起来还有许多困难。”

吉：“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

邓：“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林克光：“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说市场经济只存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4）

市场经济如何搞？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否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

以上问题，邓小平都一一给予了回答。邓小平的经济口才非同一般，在此我们可以深有体会。

16. 与金日成纵论经济建设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二人一路兴致勃勃谈了许多问题。

邓小平向金日成同志介绍了我党十二大以后的工作重心以及奋斗目标。

邓小平对金日成说：

“我们刚刚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以后，我国政治形势更加稳定，可以更好地一心一意搞建设了。

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十二大对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做了比较审慎的处理。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活。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17. 南巡讲话，震撼神州

1992年年初，邓小平先后去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是一次震动神州大地的旅行。在这次行程中，邓小平妙语叠出，讲了许多影响中国命运的惊世骇俗之言。邓小平说：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

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不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

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

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一九八九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的确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

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十年还可以，再过二十年，就八十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到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队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邓小平既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出语惊人的口才大师。他讲起话来总是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态度鲜明，口气坚决，果敢有力，爽快利落，而且充满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和罕见的雄才大略，是非常富有感染力的。在这篇著名的长篇谈话中，邓小平谈吐上的天才之光频频闪烁，俯拾即是。一些崭新的提法是十分精采，十分具有个人风格的。比如：“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搞争论”、“坚持两手抓”、“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等，都是既简洁明了，又抓住了要害。

邓小平的谈话还具有无与伦比的深度。高瞻远瞩的眼光、雄才大略的见识在谈话中一一体现出来，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他的讲话是毫不夸张的。他的谈话像一阵浩荡的春风吹过大地，又像平地的一声惊雷震撼着亿万人心。而这一切都显示了他口才的卓越和超凡。这篇著名的讲话，既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行动指南，又是口才欣赏中的经典之作，是值得我们好好品味与体会的。

18. “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在会见时，邓小平回答了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对于客人们提出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问题，邓小平给予了十分精采的评说，并为我们展示了他卓越的经济思想和口才。

下面是有关这次访谈的一部分。

格隆瓦尔德（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

格：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色，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麦克亨利（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你对现在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变动是否满意？是否认为他们会继续执行改革政策？

邓：请客人们注意我们这次党代表会议的情况。我们这次党代表会议采

取了两个重要措施。一是总结过去七年的经验，为我国经济发展确定一个适宜的速度，并通过“七五”计划，为中国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二是从组织上解决政策连续性问题，即从中央开始逐步实现领导班子的年轻化，这次首先解决的是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

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政策不对，有什么必有连续呢？如果政策对，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这种政策本身就保证了它的连续性。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从中央到各个地方，都有一批勇于探索、精力较好的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逐步实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当然还有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召开这次党代表会议是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就决定的，因为当时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年龄们高，所以决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开一次党代表会议，中心目的是实现年轻化。

普拉格（美国《时代》杂志海外版编辑）：我想问一个关于你个人的问题。在你漫长的革命经历中，你多次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方向。如果今后你不在，你希望人民如何来怀念你？

邓：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也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时候的一些错误我也要负责的，世界上没有完人嘛！

19. “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视察了天津。他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时，还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还同天津市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谈话。下面是他谈话的精采片断。

邓小平说：

我这次来天津，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看看市容，还要到港口看一看。

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你们这里有些基础设施比上海好，有些事情办起来可能容易些。你们准备向外国借一百亿美元，有没有对象？可以多找一些国家。人家借给我们钱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我向来不怕。十年时间，有一两个地方，借百把亿美元，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在此不仅感受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感受到了邓小平豪气干云的口才。这是何等的口才！何等的气魄！“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接着，邓小平又围绕着改革开放侃侃而谈：

“要研究投资方向问题。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讯上入手，我看有道理。我们在这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钱。

天津港下放两年来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无非是给了他们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

中环线搞得这么快，是不是搞了承包？就是要搞改革，搞承包，分段、分级承包，实行责任制。中山门蝶式立交桥的设计者干得好，破格批准他为工程师，应该，这是谁也不应反对的，这也叫改革。

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你们经常搞义务劳动，这也是政治嘛。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发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这个路子对，不能只靠人家扶着。他们受到了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

建设居民小区，人民群众有了好的环境，看到了变化，就有信心，就高兴，事情也就好办了。

看到天津的成绩，邓小平心情十分愉快，向时也提到了对于改革的更大希望。

20. “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 斩更多的‘将’”

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由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率领的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谈到了“理顺物价，加速改革”的问题。

邓小平以充满必胜信心的口才说道：

“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就更少了。所以，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次副食品价格一放开，就有人抢购，议论纷纷，不满意的话多得很，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中央，这个决心应该下。现在过这一关，能否成功，今天还不能讲，但我们希望成功，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

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开物价、加速改革正确不正确，也要看实践。我们现在既有顺利的情况，又有风险的情况。好在这十年来中国有了可喜的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增强。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会太慢。一九八八年尽管有风浪，速度仍然可能超过百分之十。天天在风浪中前进，但翻两番的任务一定能完成。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前景。

其中，邓小平用了《三国演义》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来形容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要一关一关地过，可谓十分生动，很有口才艺术的特点。

21. “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这是一句充满深情同时又寄予希望的话。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进行了视察。视察期间他同上海负责同志谈了许多话。其中好多话都十分精辟，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说完“要努力干啊！”这句重若千钧的话之后，开始放谈经济：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抓得比较早，这一条抓对了。有的国家就不行，所以搞得很困难。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而最后一句“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已成为新时代的进军鼓点。它在鼓舞和催促亿万中国人民加速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前程似锦的新长征中勇作先锋、多做贡献。

二、政治口才

1. 邓小平与意大利记者谈毛泽东与周恩来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会见中，奥琳埃娜·法拉奇向邓小平提出一系列关于中国政治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毛泽东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等。这位意大利记者眼光敏锐，所提问题十分尖锐。面对这些提问，邓小平从容不迫，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气魄，大智慧谈出了自己的见解。当奥琳埃娜·法拉奇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时，邓小平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奥：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奥：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

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邓：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是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奥：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

邓：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奥：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奥：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奥：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

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奥：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邓：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奥：那末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奥：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奥：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奥：我们不知道。

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奥：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零分以下。

奥：你自己怎么评价？

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毛泽东是一个令全世界都十分关注的伟人，而发生在中国 1976 年的粉碎“四人帮”事件也是震动全球的。外国记者就这些重大事件提出了很多问题，所问皆是直言不讳，切中要害，涉及到中国政治的极敏感部分。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坦率，十分真诚。他没有丝毫的回避，旗帜鲜明地讲清了自己的观点，所言皆是客观的，冷静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邓小平谈话中一贯拥有的精神，它像一束耀眼的金光使他的谈话充满了真理的光芒。在谈到对伟人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同时指出了他晚年所犯的错误，他说：“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这真是精辟有力，恰如其分的结论。

2. 要有“脱裤子”的精神

从1942年2月开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普遍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内容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影响，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权威地位，以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巩固。

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5月开始的，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了边区的整风运动。但由于一直处于对日作战前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所以直到1943年9月以前，主要是普遍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初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了整风动员讲话。这个讲话是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的又一篇重要文章，同时也是整风运动中一篇重要文献。其突出的价值在于这是中共历史上较早地称颂毛泽东，并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文献之一。

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全面阐述了整风的意义、目的、方法和态度。

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邓小平在谈到整风期间，每个同志应抱的态度时，款款道来，口才十分生动。

他说：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好好地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过去有些同志到党校，目的只是想听听报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整风主要靠自己下苦功夫。要自己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负责的精神，才会胸怀坦白，才会有“脱裤子”的精神，也才会把思想作风整好。没有这种决心的人，或者只是企图“秘密”地改正错误，不肯露出“尾巴”的人，是绝对整不好的。上期党校有些同志就吃了这个亏，于党于个人都是无益有害的。

邓小平在这节讲话中，运用了形象思维。他说要有“脱裤子”的精神，其实就是说一个人要勇于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那些“不肯露出‘尾巴’的人”，其实就是想把错误藏起来的人。

3. “……古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

秋日的南京，的确是秋高气爽。1949年9月12日下午，二野军大的大操场好不热闹，大操场变成了万人大课堂。

4点半钟，全校人员已经集合好了，排成了26个大方阵。5点钟，邓小平满面含笑由徐立行、刘华清陪同健步登上主席台。

场下立即掌声雷动。邓小平以宏亮的声音宣布了演说的题目：“今天我来看望同学们，并向大家只讲一个题目，叫做‘过关’。古人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毛主席号召我们，特别是参加革命的青年同志要过好‘三关’，比关云长的‘五关’少两关，但是‘三关’都是大关，每个大关中又有许多小关，这叫做大关三个，小关无数……”

邓小平开始逐一阐释‘三关’的内容，同时又把学习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纳入‘三关’中一一予以解决。

邓小平干脆利落，大展口才，从容说道：“干革命首先要过好帝国主义关，也叫战争关。战争这一关，我们已打了几十年，现在人民解放军用了三年时间就打败了在美帝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要警惕的是帝国主义对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他们还会用各种手段来进行破坏和捣乱。对帝国主义怕不怕？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种种灾难，而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也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斗争失败了，再斗争又失败了，有压迫就有战争，而且一直斗争下去，直到胜利。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了，难道革命青年还怕帝国主义？”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完全接受邓政委的教导。小平同志继续说，“帝国主义虽然被赶走了，但是美国帮助蒋介石封锁我们怎么办？”他继续说，“我们是被帝国主义封锁惯了的，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被封锁；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被封锁；我们就是从敌人的封锁中打出来。帝国主义的封锁只能提高中国人民的觉悟，丢掉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这倒要谢谢帝国主义，谢谢它从反面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讲到原子弹，小平同志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但是原子弹是不能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根本胜利，是苏联对日宣战，红军出兵东北，日本侵略者对战争已经绝望，因而无条件投降。”

其次，是过好封建主义关，又叫土改关。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而是要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过好封建主义关，就是当革命触及家庭、亲友的利益时，能够坚定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线。

第三，就是过好社会主义关，也叫胜利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艰巨的，史无前例的革命，它要把人类历史上的私有制度转变为公有制度；把阶级社会转变为无阶级的社会；把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转变为人民民主专政；要把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人民富强的国家。我们要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转变，不树立巩固的革命世界观是不行的。”小平同志耐心地教育青年学生，要过好社会主义关，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

最后，小平同志把前面讲的过三关作了一个总结：“过关是长期的，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要准备过关，这一关过去了，还有那一关，倒下去了，再爬起来，要不怕艰苦困难，不怕流血牺牲，一关一关地过去，直到最后胜利。”为了过好关，小平同志号召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过关，过得好不好，关键是个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要站稳立场，就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旧的世界观，做个真正的革命者。”

小平同志的“过关教育”，处处打动了青年的心弦，触及灵魂深处，把学生中原有的一些怀疑和混乱的思想完全解决了，提高了思想觉悟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志们一致反映：“听了报告，口服心眼。”并表示“一定要过好三关”，做真正的革命者。

邓小平这段演说不仅富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现实感，而且从口才学的角度说还十分具有感染力。他首先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作为引子一下把听众的注意力与兴趣提了起来，然后再单刀直入，直接谈革命战士，尤其是青年战士如何过好“三关”、要比关云长还少“两关”的问题。这种以古喻今，纵横对比的口才艺术使得听者更加兴奋，同时也使得谈话富有了生动性。

4. “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回忆（引自《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642—643 页）：到了西南，父亲工作之繁忙分毫不让战时。

你想，又管军事，又管政治，又管经济，还有民族问题，也是千头万绪，不容闲暇的。

在西南，战争结束了，父亲问他的部下：“仗打完了没有？”

父亲解释道，西南今后的工作，比普通军事斗争要复杂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他说，西南的任务是：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

九十万，指的是要把战争俘虏和投诚的九十万原国民党部队改造过来，成为人民的军队，成为能工作、能生产的人。

六千万，指的是西南七千多万人口中，有六千多万是我们要依靠的人民群众，要把人民组织起来，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生产，恢复经济。

六十万，指的是我军在西南的六十万部队，要把战斗队变为工作队，提高素质，加强纪律，去创造和建设一个新的大西南。

做地方工作，父亲的风格，与做军事工作一样，作风是简单明了，处理问题明确果断。

父亲主持开会，两大特点。

第一，开短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只开了九分钟。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多余的话，话讲完了，就散会。

第二，先听意见后作决断。每逢开会，总是各部门先发言，不管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管提出多少问题，大家发完了言，摆完了问题，该父亲发言了。他一二三四五，当回答的回答，当发回研究的发回研究，当拍板决定的立即拍板作出决定。

西南局的人都说，他们常常是带着许多问题、许多烦愁、许多疑虑而来，但散会时，则每个人都已目的明确、任务明确、方法明确。

从以上毛毛这节回忆中，我们已深切感受到了邓小平口才的一些特点。

首先，当邓小平谈到西南的工作任务时，只用三个数词就形像生动地表达了首当其冲所要做的三件大事，讲得言简意赅，而且一下就抓到了工作的本质，讲话的核心也一一俱在了。

接着是，邓小平说话从不罗嗦，开会简洁明快，他的谈话有一种雷厉风行的感觉，这也是口才艺术中不易达到的一个境界。因为一般人说话喜欢夸夸其谈，那其实是在卖弄口才，而非真正的口才。

第三是，邓小平说话十分沉着，不急于先说，也不抢人家的话头，而是先听后说，逻辑严密，有轻有重，尺度的掌握也十分恰切。

5. 打乒乓球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

据王任重同志回忆：1959年容国团得世界冠军后，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

这是典型的邓小平口才，词锋锐利，一针见血。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是专指那位搞阴谋却一天手持“小红书”的林彪。因当时受林彪的影响，思想理论界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思潮。有人甚至牵强附会地把体育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归功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对于这种作法，邓小平后来还在1960年3月25日的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作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报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央已经发了一个指示，准备还要搞点材料，再发个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

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邓小平这段有关毛泽东思想如何进行宣传的讲话可谓谈得非常之好，既科学又严肃，而且滴水不漏，十分完满。从口才学的角度说，还可以成为说理口才的范本。读者好好钻研此文，还可以大大提高自身的说理口才。

6. 邓小平针锋相对，大斗“四人帮”

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受到了来自“四人帮”的疯狂干扰和破坏。面对“四人帮”的器张气焰，邓小平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此时，一向稳重，沉着的他也讲出了锋芒毕露的话语，对“四人帮”抛来的无耻谰言给予了迎头痛击。

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搞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受到了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批评。“四人帮”对此极为恼火，会议一结束，他们就四下放“风”，说政治局会上大家的“讲话过了头”，说政治局会议是“突然袭击”，是“围攻”。

面对如此张狂的言辞，邓小平严辞回敬道：“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对照主席的批评，还讲得太浅。”这些话像一把闪光的利刃，给“四人帮”有力的一击。随后，邓小平又紧紧抓住所谓“第11次路线

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声色俱厉地质问：“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邓小平层层进逼，将“四人帮”逼入了理屈词穷的境地。随后，他再展锋芒，抛出了一句震聋发聩的话语，他说：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结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这几句话看似寻常，但却具有无法比拟的威力，它给了“四人帮”致命的一击，同时也如电光火石般使在座的人们猛醒。

“四人帮”被邓小平的凌厉言辞驳得无言以对，他们默默坐了好长时间，都找不到什么说话。最后，王洪文做了点自我批评，出于无奈，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这是九年来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第一次垂首认错。

“四人帮”这次虽说败下阵来，但他们不肯轻易罢休。1975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表中央作重要报告。在会上，江青贼心不死，胡乱插话，再次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以超凡卓越的口才驳斥江青，与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

会议开始后不久邓小平说：“这次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时江青插话道：“内容不一样。”邓小平说：“重要性一样。”

当邓小平讲到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又插话说：“是少数。”邓小平高声回敬她说：“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就是个别的也值得很好注意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缺乏粮食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即便是少数也应当引起中央的注意。邓小平的回答是负责任的答案，它显示了一个中央领导人忧国忧民的心态，这样的回答，使江青那句不以为然的插语相形见绌。随后，邓小平又继续说：“据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平均为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元，……社员有的还倒欠债！”江青不等邓小平将话说完又抢

着说：“有些债要取消了。”邓小平扫视江青一眼当即指出：“那是政策问题，中央要另行研究。”

邓小平又说：“四川倒数第二，这行吗？”江青又插话：“八千万人口。”邓小平纠正道：“九千多万罗！”

会议本来没有安排江青讲话，邓小平讲完后，她偏要讲，开口批评不重视会议，说什么“第一书记只来一个内蒙的尤太忠”。面对气势汹汹的江青，邓小平也毫不客气，当即回敬道：“各省市是按中央通知办事，主管农业的书记来了就行。”

邓小平就是这样针锋相对，毫不让步地与“四人帮”对驳的。

7.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1975年夏季是火热的，芳菲正浓，万物争荣。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

1975年全面整顿的发展趋势很清楚，邓小平和他的战友组成的“作战指挥部”，“横下一条心”，竭尽全力所要“扭转”的，不仅是严重混乱的社会和生产秩序，也不仅是“四人帮”趁机夺权的嚣张气焰，而且是力图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这是斗争逻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7月17日，在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对于全国正在开始好转的经济形势有如下一段记载：“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1975年，偏离了正确航向的人民共和国的航船正在逐渐地调转船体，逐渐地驶入正确航道……

整顿工作的深入发展，已使新一轮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日益迫近……

1975年，对于毛泽东，是一个不轻松的年份。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此时的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他一生中所做的、可与新中国领导建立并列的两件大事之一，他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同时又迫切地想扭转“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社会出现的混乱现象，希望实现社会安定；希望加快经济发展，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却与安定团结、经济发展存在着根本对立的矛盾。

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深刻矛盾。

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旦这个前提条件不存在，他对邓小平的支持也将不复存在。

“四人帮”深知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他们又一次开始活动了。

这一次，他们打头阵的是毛泽东的侄子、“四人帮”的亲信毛远新。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

毛泽东在不断听到、并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的态度变了。他在听取汇报时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不过，他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他指示在政治局内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希望能够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邓小平谢绝了。答复是：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言辞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寓刚。

1975年11月起，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又先后靠边站了。

然而，邓公“钢铁公司”的硬劲未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针

对毛远新对整顿工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驳斥：

“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的态度导致了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

一层新的阴云重新向人们心头压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8. “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对于怎样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一直是非常清楚的。1975年9月27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就说过：

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给少年儿童的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还有，毛泽东同志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社会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而且讲都怕讲，讲了就是罪，这怎么行呢？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邓小平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对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了极好的说明。口才也十分精彩。

然而1977年2月，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却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来，华国锋又在当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于1977年5月24日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鲜明而简洁地说道：“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不久，邓小平又于同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了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应从整个体系入手；而不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引用一些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来借以吓人。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了朝鲜后，回到了东北，在听取了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接着，邓小平还坚定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

9. 一个伟大的演说家

邓小平既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有，军事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凡是亲耳听过的他讲话的人都不会忘记他那让人入迷的演讲。

一位老同志这样回忆道：“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在重庆工作了五年之久，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见到邓小平同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第一次听邓小平同志作大报告，是在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大礼堂。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抗日初期在延安，就曾听过小平同志的报告。他从抗日前线回延安开会，在延安北门外的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群抗大学生，坐在黄土地上。小平同志穿一身同我们一样的灰色粗布军服，很不合身。我坐得靠后，那是没有麦克风，他的话听得不十分真切，印象不深。从那以后，十多年没机会见他。二野捷报频传，对他的名字当然是十分熟悉的。

到了重庆，他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我们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的报告就是工作指示，必须十分注意听他的讲话。

从下午一点到六点多，他站在台上，手上不拿讲话稿，发言提纲也不带，也很少见他喝水，一气讲了五个多小时，逻辑性很强，条理分明，有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真使我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从未见过作如此长报告而不停顿的人，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散场出来，大家纷纷议论：“我们的邓政委好厉害！”（那时小平同志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大家都称他为邓政委，而不叫什么书记，那时“书记”不作为称呼。）

此后，听邓政委讲话的次数比较多了。这时小平同志才40多岁，正是人生鼎盛之年，他作为中央的“封疆大吏”，担子是很重的。

有一次在西南军区大礼堂，为了整顿党风问题，他对西南局系统党政军各单位的干部作了一次大报告，他声色俱厉，词锋尖锐，指责我们有些干部进城以后，贪图享受，作风很不检点，甚至堕落腐化，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他宣布组织的决定，有的开除党籍，有的留党察看，还有的受到另几种不同处分。他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振作精神，把刚刚解放的西南地区的工作做好，上不负中央的重托，下不负西南人民喁喁之望。这次讲话时间也很长，但人们不觉其长，也不觉得累。走出会场，人们心情沉重，小平同志的这一重锤仍在耳边回响。……”

10. 一语定乾坤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极为精彩的讲话。他说：“……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地最重要的保证。”

这是一篇震动全国的讲话，也是一篇震动世界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饱满的热情和庄重的姿态，沉雄有力的气势和高瞻远瞩的见识紧密结合，使其显得气宇非凡，宏阔大气。这篇讲话向世界宣布了中国未来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为今天的中国人指明了行动的方向。这是伟大之声，这是巨人之声，这是继往开来的历史的最强音。

11. 安邦治国之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会上作了一篇十分重要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今，这个原则已在神州大地广为普及，老幼皆知。

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邓小平已告诉了我们，那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古人说，行事之前应“立主脑”，用今天的话来翻译一下，就是办任何事之前，应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当然深谙此道，为此他为我们定下了一个治国的硬道理，按西方政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治国理念。

邓小平为我们细细道来：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

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

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

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

.....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反左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反右的有力武器。有了这个有力的武器，才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在大船驶向“四个现代化”的彼岸。

12. “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979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以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第八次访华团时，谈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民主与法制。而这两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保证。

邓小平说：

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前一段时间上海发生冲击领导机关的事，那是不能允许的。这实际上是属于“四人帮”打砸抢、武斗的思想体系。

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这次全国人大开会制定了七个法律。有的实际上部分地修改了我们的宪法，比如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原来的行政体制。这是建立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必要保障。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这次会议以后，要接着制定一系列的法制。我们的民法还没有，要制定；经济方面的很多法制，比如工厂法等等，也要制定。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邓小平在谈到民主与法制时，运用了形象思维，打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3.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意见。

邓小平的这些意见十分深刻，而且口才也十分凌厉。这里节录一些段落，也让读者诸君来一个奇文共赏之吧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走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14. “谁不听他的话，他都想整一下”

邓小平不仅是一个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拨乱反正的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评价了毛泽东。

邓小平说：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

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 AB 团，打 AB 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 AB 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始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5. “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谈到了华国锋同志。

邓小平襟怀坦荡地说道：

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提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邓小平不但思想政治觉悟高，而且在说话与行事上都十分讲究策略性。

16. 为现代化事业招兵买马， 邓小平坦言出高招

要使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尽快得到发展，需要有大批的精兵强将。邓小平强国富民心切，他十分关注年轻干部的发掘和提升。一次在与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他说：

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一九七五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者授予。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样才能大胆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这次我们提出减少兼职过多、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给中青年同志腾出台阶。台阶挤得满满的，他们怎么上来？台阶有了空位又不给他们，他们怎么上来？

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一般说来，年轻人经验少了些，这是事实。但是，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应该承认，现在一些中青年同志的知识，比我们那个时候并不少。经过的斗争考验少一点，领导经验少一点，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

中国的选官制度过去一贯搞的是“台阶论”，“台阶论”在选拔官员上既有合理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东西。其利在于可以对干部进行长期考验、磨炼，保证选上来的人绝对可靠。其不利的一面在于论资排辈，老人挡在前面，有才能的年轻人难以脱颖而出；终于有一天上去了，也已精疲力竭；失去了办事的闯劲儿与活力。

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得力干将，因此，邓小平希望快点广纳贤才，他这种迫切的心情在这篇讲话中表现得格外充分。这篇讲话虽然行文朴素，言谈自然，但却充满了内在的热情与明显的活力。它的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大胆破格提拔的说法，是一种勇于创新精神的表现。“台阶”和“梯子”的说法也十分形象，准确，活灵活现。当然，无论是急切的心情也好，破格提拔的创新作法也好，都没有脱离客观实际的框架。对客观现实的冷静剖析，对行事分寸的完美把握，在这篇讲话中也是一一俱在的。

17. 这场革命不搞，可能要亡党亡国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是中国官场常见的现象，据说有这样一个笑话，说在北京上公共汽车一不小心，一脚就会踩着三个处长，这踩别人脚的人，本人或许也是个处长。这个笑话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官场的现状，其实是决不夸张的。

据 1979 年的统计，全国党政机关的干部有 279 万多人，1988 年增至 543.5 万人，十年时间就翻了一番，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

官多府大必然造成严重的财政亏空。有材料表明，全国行政事业费的开支占去了整个财政收入的 40% 以上，不少省份占 65% 以上，大多数县高达 80—90% 以上。1990 年全国财政超支 70 亿元，其中 36 亿元超在行政管理费上。

邓小平早就看清了机构臃肿、官员太多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1982 年 1 月，他就这一问题讲了番令人惊心动魄的话，他说：

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但是，早了没有条件。现在，我们经过粉碎“四人帮”，又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六中全会，创造了这个条件，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再晚些解决行不行呢？晚解决更困难，问题的本身会更严重，牵扯的问题也更多，牵扯的人肯定一年比一年多，还有一点，这个问题涉及很多老同志。现在确实也有个好的条件，因为许多觉悟比较高的老同志还在，能够带头，也能够克服阻力，只要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所以，时间不能再拖了。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地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更大的成绩，我们怎么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样能安心？不要只看到我们的工作确实有成绩，天天暴露的问题不晓得有多少啊！

第二点，这个问题要涉及到几百万人。精简不是百万，是几百万。按中央这一级来说，要精简三分之一。就下面来说，我看不止三分之一。就是四分之一，也有五百万人。当然，不完全是干部，还有一般服务人员、工作人员，也可以减少。所谓精简，是说各部门各单位都要确定编制，一部分人在岗位上工作，其他的人抽出来轮训，学习考试合格以后，到岗位上工作，再

让现在岗位上的人去接受轮训。”总之，这是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的问题。如果企业、事业单位整顿起来，涉及的人就更多了。单单机关就涉及大约四五百万人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很大。正是因为大，工作就要做细。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这个话要说到前面。特别是时间这么紧。所以，决心要大。我们政治局确定之后，要坚定不移，不能受干扰。现在一些外国人也在议论，说我们搞这件事情看起来要失败。我们下面的干部都觉得困难得很。我还是那个话，困难确实困难，但是只要我们下了决心，坚定不移，我不相信搞不成。不是要抱必胜的信心吗？我看这样的事应该抱必胜的信心。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发生问题，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预料到。不要原则赞成，一涉及到本身的利害，问题就来了。在精简中如果发生什么游行示威呀，贴大字报呀，都不要怕。在处理精简问题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一部分人中间的派性，处理的人牵扯着这派那派，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对这场革命要坚定不移。下了决心，就要顽强，不动摇，出点乱子不要紧，吓不住我们。

第三点，我建议政治局原则上批准中央国家机关的精简方案。中央直属机关的方案不够具体，可能减的人还少了。我这里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可能革命精神不够。中央直属机关不是拆大庙，但小庙多得很嘛。还有每个庙的菩萨也太多，很有文章可作的，不要以为没有好多油水。比如群众团体。工青妇现在趁这个机会搞一个精简方案，搞一个精简的机构，造成一个好传统。过去，工青妇的人也不多的，本来机构并不大，现在相当大。事业单位也不是没有油水。国务院系统精简百分之三十多一点，中央党群系统只精简百分之几恐怕太少了。对中央直属机关的方案也原则批准，但是，应该再去摸一摸，不要以为没有油水。总之，这个方案的革命性还不够。

军队正在考虑，坚决减少军队的人数。

精简方案批准以后就开始着手实行，首先找一两个部门研究编制、定额。如国务院，副总理究竟几个适当？这次会议有的同志提出两个，两个也可以考虑，可能不够一点，如果两个能够行得通，我也赞成。再加几个国务委员。这些国务委员相当于副总理，将来可以出访。国务委员的任务可以比较机动，总理可以分配他做这样那样的事。如果有国务委员，副总理少几个也可以，这个问题也研究一下。部委的精简现在就可以着手。最好先搞一两个部门，有些什么典型经验，有些什么反应，有些什么问题，跟大家见面，这样别的部门进行起来就心中有数，事情好办。总之，中央这一级的精简规定半年时间。要理个头绪出来，半年的时间应该够了。人员的处理是另一件事，但是机构要理出眉目。人员完全处理妥当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把一个一个部门的编制搞出来，我看半年时间应该够了。如果实在不够，顶多三个季度，不能再迟了。当然，省、市、自治区待中央机关进行一段时间以后也可以着手，不必等到中央处理完毕再开始。我们的方案确定了，又有了几个典型经验，各地方就可以开始搞。中央一级先找一两个单位，比如说首先从外贸系统开始，试试看。还找一个什么单位？可否找合并简便一点的水利部、电力部？看看究竟有些什么问题。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会从各种各样角度提出问题。精简方案不可能一下子很完备，大体上差不多就行了。原则上是从紧，要放宽很容易。这一次我们紧了之后，硬着头皮不放宽。比如规定定额，副部长是几个人，以后人员可以动，但是名额不能动，这样有利于进进出出。要不

然不得了。要做到进一个人真不容易。这样做了，才能给我们起用比较年轻的干部创造一个条件。定了额，每个同志都要实实在在顶一个人做事，不能挂名和半挂名。有些同志说自己还行，到真正需要顶着干的时候，究竟行不行？那就要经得起考验了。要我做八小时工作，我就肯定不行。

总之，今天原则批准这两个方案，就着手干。经过个把月，抓一两个典型，制定编制，规定定额，规定各单位和各个人的职责界限，包括具体的人事安排，看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篇令人欢欣鼓舞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以坚定不移的姿态，迅疾有力的语言向人们大讲了精简机构的重要。他急言相告，痛陈利害，说：“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这真是威力无比的口才，他的话讲到了点子上，讲到了关键处，真是透彻淋漓，直逼要害。此语一出，无不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随后，就如何精简机构一事，邓小平又作了具体的指示，这样，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作法相交织，直是完整充分，妙不可言。

18. “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

早在 1975 年，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曾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求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交，在他治病疗养期间代理总理主持会议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一作法令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大为恼怒，王洪文在上海口出狂言说：“十年后再看。”当时他刚满 40 岁，而邓小平已经 71 岁了。

王洪文的这句叫嚣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十分清楚 71 岁和 40 岁之间的差距意味着什么，他当即对李先念等老同志谈了自己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他说：“十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邓小平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

到了 1989 年的时候，邓小平准备退休了，这时，对接班人和新的领导班子的关心就成了他极爱提到的一个话题。邓小平曾说：我们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对接班人培养得怎么样。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就要安排后事了。所谓后事，就是要找好的，可靠的接班人。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这是多么感人的肺腑之言啊！它讲出了一个老革命家对国家对事业强烈的责任感，讲出了他令人崇敬的高尚情操。

1989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在给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谈到了这个话题。他以坚决果断的语气说：

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

邓小平高瞻远瞩，洞察深微，寥寥数语就道出了获得长治久安，人民拥护的关键之点。随后，他指出了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的另一重大特征，他说：

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以香港为例，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今天请你们来，让大家来考虑一下这个论点对不对。一个是组成具有改

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要惩治腐败。体现我们不但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拿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心里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如果不从更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末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平静都靠不住。要看到这个大局。

其后，邓小平对我国高层领导作了历史性的回顾，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分析说：

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人都有缺点，我们在座的人都有缺点，别人一样也有缺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弱点。当然缺点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毫无疑问，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班子有弱点，这是事实。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的。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不是说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满意，而是对这个集体满意。人们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邓小平的这段谈话是十分中肯的，十分合理的。他对我党三代领导人的分析与评价既公正合理又独树一帜，讲出了实话，讲出了真话，讲出了令人耳目一新内容。

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员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

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作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

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现在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过去毛主席就曾经长期敢于用反对过他的人。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人都是有缺点的，进了班子后还可以继续改进。

一个是现在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再一个是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

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他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你们是要在第一线顶着干工作的，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一点。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

最后这部分讲话真不愧具有大家的风范。“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这一系列闪光之言无不体现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高尚情怀和巨人气魄。这些言论当我们听到或读到时都会深深被打动，被震撼，并由此产生无限的钦佩与崇敬。

19. “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

为了让年轻的中央领导同志放开手脚，独立工作，建立威信，邓小平晚年一直在有意识地缩小自己在领导层中的个人作用，他希望自己在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在很多场合他都讲了一些有关自己退休的话。1989年6月16日，他对中央负责同志说：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我在跟李鹏、姚依林同志谈话时说过，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待。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是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邓小平是位伟大杰出的政治家，他的谈话总是充满了无穷的智慧和非凡的胆识，他敢于面对现实，从不回避问题，对国际国内局势又有冷静清醒的分析，所以，在谈到自己退休的时候，他能够高屋建瓴，讲出十分精辟的话语：“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这一说法无疑是他口才上的华彩乐章，具有惊世骇俗的效果。

1989年9月，邓小平又一次谈到了自己退休的问题。这回他的言谈质朴，真诚，一种谦逊淡泊，坦荡无私的风格足以使所有的听者都深深感动。

邓小平说：

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的方式。

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因为在国际上了解我这个人的不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因素之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

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这次事件一出来，我考虑马上退不行。现在过了三个月，如果到五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差不多还要一个半月，有了四五个月，政治局面就比较平静了，这是个时机。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人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我同杨尚昆同志谈过，越简单越好。不要形成个惯例，对退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你一生是什么样子，你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人们都是看到的，有个客观评价。我反复考虑，简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利。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还有些形式，比如追悼会，开得那么多，花的人力物力不少，也可以简化一下。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确实都有功劳，也总有一些失误，但一讲都是功劳。我多次拒绝外国人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那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同志。但有些自传还是宣扬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得不得赞扬。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这之后，邓小平又谆谆告诫新的领导人，他语重心长地说：

总之，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独立思想，独立工作。今天常委的同志都在，我希望你们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我们在两三年内要好好地调整，过去失误的，例如通货膨胀，弥补起来。

……

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集体，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需要。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在历史上，我们有毛主席这个核心。这几年我们出现了两个领导人更迭以及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个核心，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江泽民同志应该成为你们这个集体的核心。关于工作

方法，我提一点：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做多方商量，贯彻执行。

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作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战争年代形成过山头，当时我们靠马克思主义觉悟、靠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没有形成什么派。就是那样，山头主义也有影响，所以专门反了一次山头主义。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搞久了也可以调动一下。

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

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但是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要搞几个大项目，表示我们的信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三、外交口才

1. 实事求是，让卡尔逊大为尴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一位美国人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来到了中国，在此后的18个月里，他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对中国各个抗日战场进行了认真考察。1940年，他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该书记述的就是18个月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游历中国的见闻”，堪称抗战初期中国各战场考察实录。

卡尔逊在华北战场上考察时曾来到河北省南宫县。在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他会见了该师副师长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邓小平。

据卡尔逊回忆，在这个水果之乡（南宫县）他与邓小平和徐向前进行广泛的谈话。其中一次谈话，邓小平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时，卡尔逊问徐向前：“我特别想知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知道这是每个八路军战士都要宣誓去履行的。”

邓小平边吃水果边从容说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对外政策；6，战时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邓小的记忆力相当好，而且并未卖弄口才，而是让口才自然而然地畅通而出。接着，他还纵论了国际形势。他说话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对情况的充分掌握让卡尔逊大为吃惊。

尤其当邓小平告诉卡尔逊：“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卡尔逊惊愕道：“你能肯定吗？”

“是的，”邓小平十分笃定地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这一来搞得卡尔逊十分尴尬，他说：“必定是电讯搞错了。”在此，我们感到了邓小平口才的锐利。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15岁就离开家乡到了法国巴黎，在巴黎勤工俭学并参加革命活动长达5年之久。这段经历无疑使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阔了大视野，看问题自然具有世界格局，心胸也自然十分博大，后来又去苏联留学，进行了坚定的马列主义训练，思想与口才当然锻炼得炉火纯青。

从编者所能收集到的资料看，邓小平与卡尔逊的谈话，应是他第一次以共产党的一名重要领导人的身份第一次从事外交活动，而且谈吐不凡，表现出重原则、重实事的一流外交家风度。他不仅给卡尔逊留下至深印象，也给我们留下至深印象。他日后在国际大舞台上纵横捭阖，大展鸿图当是后话，读者们也会会在本书后面陆续读到他高超的外交策略与外交口才。

2. 从“乱中”理清全球三大矛盾

众所周知，毛泽东曾根据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急剧分化和改组，于1974年2月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说法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邓小平在联大发言时，首先开宗明义，提出了中国政府当时的立场：“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

经济权益，为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接下来，邓小平纵论国际风云，一语点出“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

为什么呢？邓小平层层道来：“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变。整个世界动荡不安。”接着，邓小平用了一句中国的说法来形容世界的局面，那就是“天下大乱”。在这个“乱”字当中，反动势力走向衰亡，而人民的力量却日益增大。

接着，邓小平以严密的逻辑分析，从“乱”中理出存在着的三大矛盾，而这三大矛盾正形成三个世界的国家相互斗争着的格局。

邓小平干脆点出了这三个世界。他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接着，邓小平大展其口才的锐利，剑锋直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一点数他们的不是。

谈完此点，邓小平再转论“第二世界”的一些国家，指出这些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葡萄牙，这个国家，它“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

而发展中国家呢？

邓小平以充满诗意的激情说道：“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更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最后，邓小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又一语点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也必然存在着矛盾、同时又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以及与“第二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大矛盾。因此，可得出“超级大国”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邓小平在联大的这次发言，气势恢宏，论理清晰，具有极高的口才艺术欣赏价值。

3. 挂帅出征，舌战赫鲁晓夫

1960年9月莫斯科将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大会。而那时，中苏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已经公开化。但是中国必须前去赴会。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得到了中央的一致同意。

邓小平一行到达莫斯科。交锋很快就从欢迎国宴上拉开了。

赫鲁晓夫陪着邓小平在主宾席前就坐。几次敬酒刚过，赫鲁晓夫就开始发话了：“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运动老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赫鲁晓夫这席话显然是借阿尔巴尼亚来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十分坦然，放下酒杯，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应该好好地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可他们总和我们过不去。”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你们有不同的看法。”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呀！”赫鲁晓夫生气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还骂我们，说我们

是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邓小平沉着且毫不含糊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邓小平这最后一句绵里藏针的话击中了赫鲁晓夫的要害，须知，正是在赫鲁晓夫的旨意下，苏联才单方面撕毁了对中国的援助合同，撤走了专家。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是令人痛恨的。至此，赫鲁晓夫语塞起来，不知说什么为好，不过，他也不肯示弱，沉默了片刻他就又毫不客气他说。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对斯大林的问题上态度那么前后不一致呢？”赫鲁晓夫的粗暴性格现在又显露出来了。

邓小平显然不买他的帐，很干脆地回答说：“不对！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不！你们开始赞成我们，后来却又在反对我们。”

“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个原则问题是要说清楚的哟。反对搞个人迷信我们过去赞成，现在也赞成。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态度，刘少奇同志向你们的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党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同志，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过没有？”

邓小平随即把目光落在一旁的米高扬身上，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些不自然地与赫鲁晓夫对视了一眼，忙调开了目光，端起杯子到别处敬酒去了。

赫鲁晓夫气得用手拍打了一下桌子：“对斯大林的问题，我们是不能让步的，他是犯下了罪的……”

“不应这样一概而论！赫各晓夫同志，我们反对搞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怎样看待，这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评，但成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

“你知不知道？我们苏共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都更深切，我们受

害也最深。”

“个人迷信要批判，但对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借反对个人迷信来攻击其它的兄弟党。”

邓小平毫不含糊，把气势汹汹的赫鲁晓夫弄得来一下子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

大厅里乐曲声还在回荡，宴会进行到了一半时间了。赫鲁晓夫用指头轻轻弹了弹酒杯，突然他的思维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他脖子一直，说道：“你知道的，高岗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你们中央却清除了他，这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高岗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这可是你说的啊！”邓小平的语调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他抓住赫鲁晓夫这句话里的轻率和不负责任，庄重地说：“今天我们都要把你的这个讲法记录在案的。”

赫鲁晓夫无言以对了，但他马上话锋一转又说：“邓小平同志，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们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呢？”

“你们喜欢的人，我们就给你们，这难道不好吗？”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邓小平说完这句话后就不再理睬赫鲁晓夫了。

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这场舌战以后，与邓小平直接谈判的苏方首席代表苏斯洛夫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向邓小平进攻。他吸取了赫鲁晓夫败在邓小平手下的教训。谈判中他常常以一种讨论式的口吻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和批评。邓小平的口才出类拔萃的，无论对手采取什么方式向他进攻，他都能巧言相辩，应对自如。

一次会谈中，苏斯洛夫对邓小平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这是我们不得不撤回来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呢？”邓小平反问一句。

“现在中国的气氛已经不适宜我们专家工作了，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拔白旗。在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让你们送了一面白旗。这证明你们对苏联专家的态度使得他们无法工作了，撤走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

苏斯洛夫讲得不紧不慢，很有依据，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下子被他弄愣了。邓小平悄悄示意工作人员立即向国内挂个紧急电话，对上述情况进地核实。当工作人员把国内核实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后，邓小平不动声色他说：“同志们，刚才苏斯洛夫同志说，我们给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送了白旗，这是造成苏联撤走专家的原因。我们刚刚做了核实，确实是送了一面旗，也的确是白色的。”邓小平说到这儿，略微停顿了一下。

“不过，我想告诉苏斯洛夫同志的是，这面白旗是锦缎制成的，还镶有一道漂亮的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色大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这就是实际情况。”

邓小平一言即出，便切中要害，苏斯洛夫一下子不知所措了，他把目光不自然地调开，耸耸双肩，做了个表示遗憾的神情，双手不住地搓动着。

邓小平继续用一种深沉而极有分量的声音说：“苏斯洛夫同志，可见你们掌握的情况与事实出入有多大的距离呀。”

“这……这也许是些不值一提的枝节问题。”

“那我们也来说说重大问题吧。”邓小平的目光中闪射出了一种义正辞严的光亮，语调也显得严厉起来了。“那么，你们到底为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走专家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这涉及到了我国各重要的经济部门，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你们片面的、单方面的违反国际准则，撕毁了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们的做法不仅给我们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的目光才行——”

邓小平的话字字如千斤，重重的击在人们的心上，会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凝重起来，各国代表都能掂量出邓小平这番话的历史分量。

26 国党的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终于拔掉了文件中的一些钉子，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最后邓小平同志在会议结束时再次对赫鲁晓夫说：“对于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有保留意见，留待 11 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讨论解决吧，为了国际共运的团结，我们已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26 国会议后，中苏分歧公开化、激烈化，大辩论达到一个高潮。……

在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中苏商定于 1963 年 7 月 6 日至 20 日再次在苏举行会谈，我方代表团团长又是邓小平。

会谈开始之后，邓小平与苏斯洛夫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更大的口才较量。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滔滔不绝做了长达 70 页的讲话，对中共大加指责和攻击。邓小平沉着冷静地听完他的长篇讲话，没有当场反驳。7 月 8 日，在第二次会议上，根据规定由邓小平发言，这时他才大展口才，对苏斯洛夫的长篇大论进行了猛烈地回击。邓小平的讲话从容不迫，有理有节，他毫不含糊地批驳了对方的肆意攻击，捍卫了中共的原则立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回顾历史，中苏之间这场大辩论的发展和起因，其责任不该由中国承担……”

邓小平一口四川话，字字有力，句句在理，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他说：“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整个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歪曲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苏斯洛夫不肯轻易言败，中苏双方的辩论在逐渐升级。然而就在这种紧张激烈的对抗性辩论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苏共中央公然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未结束之前，双方不得公开发布消息”的协定，7 月 14 日在双方的会谈正呈难分难解之际，居然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 7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苏共的《公开信》，并加了编者按，明确指出：“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其中这样的例子总共有七、八十处之多，举不胜举”……

会场外公开挑衅激起了中共代表的极大义愤。在 7 月 19 日的双方会谈中，我方严肃地批评了苏方不守协议，明显地违背马列主义立场观点的做法。

苏斯洛夫被我方的严肃批驳激怒了，一反他“沉稳”的性格，对我方提出了“最坚决的抗议”。

他对邓小平说：“我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

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中共代表团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

邓小平同志立即批驳了他：“你们还提出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

“你们想抗议什么？”苏斯洛夫有点心虚。

“苏斯洛夫同志，这不是明摆在眼皮底下的吗？”邓小平声音不高，但很严厉，一下把对方打哑了。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邓小平说话了……

“鉴于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建议今天的会谈暂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外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再商量。”

这一轮中苏两党会谈在举行了九次会议后结束，会后发表了双方达成的例行公报。

当天下午6时，在卡捷琳娜宴会厅主宾席的老位置上，邓小平与赫鲁晓夫又见面了。当然，他们谁也没忘记两年多之前在同一场合两人的交锋。

邓小平襟怀坦荡地举杯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代表中共中央重申，邀请苏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下一轮在北京举行的两党会谈。”

赫鲁晓夫也若有所思地举杯说：“我们一定派代表团到北京来，一定来……”

至此，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的交锋才暂告一段落。

4. “一秒钟的功夫就可以解决”

在中日外交史上，有一件举足轻重的事情就是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签订。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这个条约的缔结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1974年，中日双方开始酝酿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然而，经过多次谈判和协商，到了1977年秋天，条约的缔结仍然没有成功。这是中国外交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苦战。

1977年9月，重新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接见以滨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福田首相表示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对他寄予希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问题来说，一秒钟的功夫就可以解决。”

“一秒钟的功夫就可以解决”是一句绝妙的外交辞令。它显示了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希望尽快缔结条约的迫切心情，同时也在暗中敦促了日方，让他们尽快痛下决心。邓小平的这句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多方面的努力，这之后不久，中日双方的谈判果然又有了进展。

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再次来到中国，8月9日，两国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会谈。园田直坦率他说：“这个条约日本沾两分光，中国沾八分光，所以，你们别耍手腕，还是在华国锋主席去罗马尼亚前缔结的好。你们中国搞外交有一手，但不善于交际。缔结条约之前，日本人和中国人首先要进一步相互理解。”在双方分析国际形势时，园田直又说：“如果条约缔结不成，我就不能回日本了，只好在北京自杀。我没有退路，你们也一样，如果谈崩了，我和你黄华外长都会受到世界的耻笑！”

8月1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园田直，虽然园田直是个有胆有识，灵牙利齿的外交家，但邓小平的外交口才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从容地应对着园田直外相，谈吐极为潇洒。当双方谈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邓小平郑重他说：“那是名存实亡。那个条约规定，提前一年通知就可以废除。明年四月就到期了，我们将采取适当办法宣布废除。”

邓小平坦率的话语使园田直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小心地又问：“这个问题，对外可以讲吗？”

邓小平将手一挥，连声说：“尽管讲，尽管讲！”

园田直十分高兴，随后又吞吞吐吐地问：“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讲的话，就无脸见江东父老……”

邓小平大方他说：“你尽管讲嘛！”

园田直说：“尖阁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领土，再发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代。”

邓小平严肃讲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然后微笑着摊开手说：“上一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这样的回答真是意味深长，含蓄无比。随后邓小平又说：“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

8月12日下午7时许，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终于签订了，黄华和园田直分别代表两国签了字，宾主双方都举杯同庆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1978年10月22日，为交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批准书，邓小平正式访问了日本。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来到首相官邸拜访了福田首相。当天中午，他访问了日本皇宫，与裕仁天皇在皇宫正殿行厅举行历史性会见。

这是二战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会见日本天皇。二次大战中，日本对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虽说现在中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但中国领导人在此次来访中会对日本天皇讲一些什么话呢？这是令所有日方人士都提心吊胆的事情。

会见开始之后，身穿西服的裕仁天皇首先伸出手去同邓小平及其夫人握手，说：“热烈欢迎，能够见到你们，很高兴。”

邓小平接过话头，微笑着说：“感谢贵国的邀请。”

随后，天皇把皇后向中国客人作了介绍。天皇和邓小平相对而坐，皇后和卓琳并肩坐在一张沙发上。

天皇首先开口“你在百忙中不辞远道到日本来，尤其是日中条约签订了，还交换了批准书，我非常高兴。”

邓小平回答说：“中日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邓小平的这几句话讲得非常诚恳，也非常高明。他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既表明了我国着眼于未来的积极态度，又巧妙地点到了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非讲不可的问题。他的谈话是非常含蓄，非常艺术的，既体现了一种宽宏大量的大国风度，又自然他讲清了必须要讲的话，使那些一直提心吊胆的日方人士总算松了口气，天皇的紧张情绪也随之消除了，他似乎也受到极大的触动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那已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对每个有良知的日本人来讲，战争责任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中日关系而言，天皇的脑海里大概一直萦绕着战争责任问题，因此才有可能在邓小平的触动之下，一气讲出原稿上没有提纲也没有的心里话来。共同社说：“陛下在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件’这一措词，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一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这是邓小平超凡口才的效力。

邓小平点点头：“一点不错，我赞成。”

“您身体很好啊。”

“我七十四岁，听说陛下比我稍大一点，身体却很好。这最要紧。”

皇后插话说：“北京很美吧？”

“北京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正在加紧进行改造。”

“东京也有公害问题。”天皇说。

“看天空，好像在逐渐好起来嘛，北京可差远了。”

尔后，两人又从城市问题谈及植物和历史，越谈越热烈。

会见结束时，天皇和皇后把一张署名的照片和一对银花瓶赠送给邓小平和夫人，中方回赠了一幅画着驴子的水墨画卷和彩色刺绣屏风。

5. 在美利坚语惊四座

在中美建交过程中，两方首脑进行过无数次交锋，这些交锋既是才智上的较量，个性上的较量，更是口才上的较量。在这一紧张激烈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代表中方与美国代表会谈，他出言不凡，妙语联珠，为中美双方建交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1974年11月，基辛格第七次来华，当时由于周总理已住院治病，便由邓小平出面与基辛格会谈。

由于中美建交一事已经历了许多波折，基辛格已没有往日那么热情了。会谈开始后不久，他就指着摆在他面前的三本很厚的提要手册对邓小平说：“邓副总理，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向你念一遍。”

邓小平说：“博士阁下，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说：“有好几吨重，而且还准备了不少，我讲的仅仅是开场白。”

邓小平又说：“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

这是一番十分有趣的对话，基辛格的谈话中显然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不悦，而邓小平的回答却是机敏巧妙的。他用风趣的话语回答对方，言词轻松而有弦外之音，基辛格一下子就充分意识到邓小平口才的厉害。他伸手扶了扶眼镜之后又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处境均不相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有一股不可小视的亲台势力，因此，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美国将在一九七七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以便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过程中关键性的问题，基辛格讲出这一番话之后，邓小平严肃他说：“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断然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邓小平这番话讲得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它无情地戳穿了美国想搞“一中一台”的企图，明确表示了中国方面在这一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捍卫了我国的利益，使基辛格也一时无话可说。

1978年5月，卡特总统派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布热津斯基此次来华，主要是想与邓小平会谈，以推进中美建交的进程。邓小平一见到美国客人就关心地问：“长途旅行，一定很累了吧？”

布热津斯基兴致勃勃地回答道：“我不累，我的劲头儿很足呢！”

邓小平将话转入正题道：“我们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喜欢痛快，毛主席是军人，周总理是军人，我自己也是军人。”

布热津斯基马上说：“对！军人说话就是痛快。我们美国人也是以说话痛快出名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美国人不容易理解，或者美国不容易理解。”随后，布热津斯基又郑重严肃他说：“卡特总统要我带话给阁下，我们准备认真地谈，不光是谈国际形势，也不光是谈如何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来促进共同的目标和排除共同的危险，而是要开始更积极地谈关于我们双方当前关系的问题。”

邓小平道：“只要卡特总统下决心，我看问题是好解决的。”随后他话锋一转问道：“你认为怎样才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布热津斯基说：“关起门来，只限在座的诸位听。我可以告诉你们，总统本人准备尽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再拖延下去……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负起政治责任，来解决我们双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你们的问题”。随后他又强调说：“我奉命向你们确认，美国接受中国的三条，即：撤军，废约，断交，再次肯定美国上届政府向你们所讲的五点。我愿意把我到北京讲过几次的那句话再在这里重复一遍：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邓小平听他讲这样的话，就马上干脆地说：“我想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期待着卡特总统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好吧，咱们谈别的题目吧！”

邓小平不愧是一位谈判的高手，他能够迅速抓住机会，当机立断，说出极为关键的话来，他在会谈中出色的口才给布热津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布热津斯基的日记本中他这样写道：“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者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浮沉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

1979年1月1日，中美之间终于正式建交了。1月28日下午，邓小平等率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了正式欢迎仪式，晚上又举行了盛大的国宴。邓小平在美期间，同美国总统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进行了多次会议。在这些会谈中，邓小平谈笑风生，口才一流，魅力无穷，令美国官员也深深地佩服。美国总统卡特也在日记中写道：“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1月31日，在白宫东厅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邓小平和卡特亲自签署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走》和“文化协定”，黄华，方毅分别和美国签订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领事馆的协定》、《教育，农业和空间合作谅解的换文》、《关于高能物理合作协定》等。签字仪式后，邓小平以乐观的口吻说：“我们刚才办了件大事，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又说：“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地展开，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

卡特总统也热情洋溢他说：“我们已经找出了一条新的，不可逆转的途径，通向更坚实，更有建设性，更富有希望的两国关系。”

这时，一位美国记者向邓小平提了一个不客气的问题：“你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在坐的人门都紧张起来，不知这一问题邓小平听了会不会生气，连卡特总统也有些不安地瞧着邓小平。此刻，邓小平平静地微笑着回答说“有”！

这一个“有”字提起了在场的人们的兴趣，他们纷纷侧耳倾听着，想看看邓小平怎样解释这个“有”字，这时只见邓小平稍停了停，便掷地有声他说：“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人们都知道，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台湾方面当然是极为不满的，那位美国记者的提问本是想刺探一下我国政府内部有无反对的力量，但邓小平用那样的话来回答他，既给了他一个正面的回答，又进一步重申了台湾为中国

的一个省份的立场，真是太机智太巧妙不过了。人们都没有料到邓小平会这样回答提问，他们原以为邓小平会被这个问题难住，没想到他十分轻松十分高明地回答了它。这一回答真是语惊四座，绝妙异常，人们纷纷为邓小平机智风

趣的回答鼓起掌来，再一次领略到这位中国领导人超凡的口才。

6. 邓小平直言舒尔茨：“有摩擦， 但责任不在中国”

1983年2月，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当时，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十分猖狂，邓小平在会谈中严辞谴责了它，但美国的舒尔茨对此很不服气，他竭力为美国方面辩解，于是，在邓小平和舒尔茨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

当双方入座相互问候之后，邓小平很快把话引入正题，“自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发展比较正常。作为中美双方，我们都应该珍惜这种关系。”

“但是，邓小平先生，”舒尔茨说，“在某些地方，还是发生了些小摩擦。”

“是。有摩擦，但责任不在中国，”邓小平指出，“就说技术转让吧，中国并不是非美国的先进技术不可。老实讲，我们搞现代化主要是靠自力更生。即使美国的技术可以全部转让，中国也未必就全部买进。”

“某些尖端技术，”舒尔茨略带傲慢地摇摇头，“可能也不是贵国自力更生所能办到的吧。”

“不，您错了！”邓小平用事实驳斥，“原子弹、氢弹和所有的核武器，算得上‘尖端’吧？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一直在对中国搞封锁。但是，我们不都一一通过独立钻研，自力更生，办到了吗？”舒尔茨没有那么傲慢了。”

“问题不在于美国对我们转让什么，而在美国究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还是真正的朋友？”邓小平坦率而又严肃地对舒尔茨说，“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心中，同美国能不能交朋友，美国够不够得上朋友，还存在着许多疑问呢！”

“这……未免太多心了吧？”舒尔茨感到尴尬。

“不，这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邓小平继续说道，“别说历史上美国对中国不平等，就是现在，也未必平等。前不久，美国司法机关公然企图‘传讯’中国政府，这是典型的霸权行径，真是岂有此理！请转告里根政府，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邓小平先生有所不知，美国司法制度是独立的，”舒尔茨辩解道，“政府无权过问呀！”

“如此说来，美国实际上就有三个政府了：国会，内阁，法院。那么，究竟要人家同你们哪个政府打交道好呢？”

邓小平义正词严，谈吐锋利，在抨击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上毫不留情。他的一席尖锐有力的话语驳得舒尔茨哑口无言，只有默不作声了。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说：“请转达我对里根总统的问候，并告诉他：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受侵犯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7. “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

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永不称霸”。

邓小平这次讲话，谈了两个重点。他首先谈了国内问题。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都高兴。现在的情况比较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着艰苦奋斗的传统。其次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还有就是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方针，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在“四人帮”时期要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他们说这是洋奴哲学。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世界各国后来不是也利用了嘛！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再加一条，那就是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总起来说，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丰富的资源，加上利用世界的先进技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当然也不那么容易。世界上先进技术发展很快，发展速度不是用年来计算，而是用月、用日来计算的，叫做“日新月异”。我们就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和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来算，还是比较低的。现在我们的方针政策已经明确，我们的口号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

谈完国内问题之后，邓小平言简意赅地讲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以及义务。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这个思想现在人们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现在还很穷，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是将来我们发展了，搞不搞霸权主义。朋友们、你们都比我年轻，你们是可以看到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国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作了一篇讲话，讲的就是这个内容。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邓小平在谈到外交时，不仅思想十分丰富，口才也尤为生动。

邓小平不但为我们摆正了中国与别国之间的关系，他于1980年5月31日，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还为我们制定了一条如何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原则。

邓小平以他实事求是的精神说道：

我们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是回过头看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不久前我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同志谈话时说，过去我们对意共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也说，正确的并不都在他们方面。我说，我们两党之间过去的争论一风吹了。

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8. 与施密特纵论天下大事

1984年秋，施密特应邓小平之邀，第二次访华。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在此之前不久，即8月28日，邓小平已满80岁，但他给施密特留下的印象总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他在谈话中对答如流，富有幽默。在谈话的每一部分都对情况了如指掌，思想集中。

经过一阵开场白地寒暄之后，邓小平说：“说到年龄，你知道，老化一直是中国领导的一个问题，也是苏联领导的一个问题。但十年至二十年之后，中国将有比较年轻的领导人。我们很清楚，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领导人。需要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在一九七五年的谈话，那次谈话之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施密特回答说，“可是你又回来了，这是你的幸运，特别是中国的幸运。你到底被打倒了几次？”邓微微一笑说：“当时是第三次，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邓小平严肃起来，并且很快地言归正传。“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是更加坚决地独立于超级大国，这一点也适用于你们的国家。当然，这不是要反对西欧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但你们不应把德国独立的战略丢掉。戴高乐懂得这一点。欧洲同美国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在这一点上，施密特认为邓小平肯定没有改变他最近十年中的看法。并且认为，自从一九七四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深刻地打击了欧洲国家，以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受到了损害，从而也使欧洲对美国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

邓小平把话题引到苏联。“中国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障碍。苏联实行的政策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欧洲形势怎样？”

施密特回答说：“自从一九七六年以来，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也恶化了。这部分地与针对欧洲的SS—20导弹有关。但入侵阿富汗这件事也使欧洲震惊。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也希望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我们正在敦促限制军备。”

邓小平说：“我估计，就撤走他们的导弹而言，苏联会不断制造新的困难。不过美国人也不很明智。他们言行不一。”

“苏联和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破裂了呢？因为苏联不断企图干涉中国的事务，因为莫斯科竭尽全力想控制中国。俄国想当老大哥。当我们表示反对时，克里姆林宫干脆就撕毁两国的合同。最后苏联公开站到反对中国的一边，并到处企图煽动东南亚国家反对我们。”

施密特问苏联在越南所起的作用。邓小平回答说：“你知道，对莫斯科来说，越南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苏联在那里奉行的是和美国在台湾奉行的相同战略。人们一直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的政策同社会主义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多少关系。”

“我感到，就其政治目标和在地球上的进攻方向而论，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按社会主义的理想行事，毋宁说是按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俄国扩张主义的传统行事。”

“大概是这样，”邓小平说，“因此我还不信，领导人的变动会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你看，中国在越南的独立战争中始终支持越南，先是抗日，而后是抗法，最后是抗美。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价值二百亿美元

（按当时的价格）的物资，而且是在我们自己需要每一个美元的时候。但几年以后，越南在苏联影响下站到了反对中国的一边。他们把数十万中国人从越南赶出来。以后，又在中越边境一再进行新的侵略。”

最府，在波尔布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占领了柬埔寨。越南这次侵略的目的是要建立大越南联邦。中国不愿意看到越南在这一地区称霸。因此，我们在一九七九年不得不给越南一次教训。为了使我国正确地理解，我们重复了几次小规模教训。如果越南继续拒绝从柬埔寨撤军，我们保留再次教训越南的权利。越南这样做受到苏联的完全支持，因此越南占领柬埔寨是我们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我们同越南的关系可以从越南撤军后的那天起正常化。”

接着邓小平谈到老挝，但他一再回头来谈柬埔寨问题。很自然，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施密特从西哈努克那里知道，他的作用很多取决于中国。就此，施密特问了邓小平。回答是：“我们劝西哈努克，柬埔寨从越南占领下解放以后不再回到社会主义。希望他建设一个和平的、不结盟的国家。如果柬埔寨愿意参加东盟，我们也丝毫不反对。”

当谈话转到日本以后，施密特说：“按照你们的想法，日本也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正因为日本人懂得，他们在苏联面前是无自力自强的，所以他们对美国的依赖还要增长。这反过来又必然使苏联恼火。在我看来，日本人似乎面临一个长期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想减少自己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做得太过分，以便使其他亚洲国家不因日本自我武装而感到不安。”

邓小平说，中国同日本有良好关系。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是因为日本有一些人想把经济上的强大变为政治和军事强大。“中国对此并不十分不安，但你说得对，这使其他国家感到担忧。”施密特表示异议，说：“我经常去日本，但我却并未发现有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如果你原则上主张日本更多地独立于美国，那么合乎逻辑的是，应当允许日本在防务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性。”

邓小平强烈地表示反对说：“不，不！如果日本想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因素，这没有问题，它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但如果日本要在军事上寻求更大的影响，那只会使亚洲处处引起人们的忧虑。简而言之：对日本来说，谦虚一点好。”当施密特问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时，邓小平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相似的弱点。他们的实际行动同他们口头上说的往往不相一致。没有平等的伙伴关系怎么能起作用呢？中美之间对台湾有分歧。里根有一次说过，台湾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华盛顿在上海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政策一如既往，仍然是摇摆不定的。国会通过一些决议，这些决议所指的方向与上海公报完全相悖。实际上他们还总是以两个中国为基础，把台湾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另外，华盛顿视台湾为自己的基地，他们坚持‘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这是指台湾、以色列、中美洲和南非。

施密特又问：“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有朝一日能否也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邓小平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也这样希望。”

谈了整整一小时后，施密特把话题转向中国的军队和邓小平在军队领导中的作用。邓小平当时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虽然他不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也不在政府任职，但他是四百万军队的事

实上的总司令。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正准备举行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大规模阅兵式。

邓小平表示，军队没有问题。不过很多军队领导人年纪过大。“但是你看，军队需要一位象我这样年纪更大的老将作总司令。”但他考虑几年后摆脱这一职务。如果高级军事领导岗位由七十岁的人，总司令甚至由八十岁的人担任，这是不好的。团长应当由三十岁以下的人担任，师长不应大于四十岁。”

施密特觉得他说得太年轻了。就插话说，他想象五十岁的人当师长也可以。邓小平反驳说：“不，这不行。否则师长以上还有更高的职衔，这些更高级的人就太老了。就是集团军的首长也不应大于五十岁。当然，这只能慢慢来。”

当施密特问将领们的政治态度如何时，邓小平说：“军队不愿意再有文化革命……我们要使军队现代化，但我们暂时不想为此拿出太多的钱。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再抓军队。其实，我们的核武器目前也只是象征性的，无论如何我们的核武器不多。我们注意到，苏联的经济失灵同它过高的军事开支有多么密切的联系。”

施密特表示，中国究竟打算如何从根本上培养年轻的经济管理人员？邓小平说，现在当然要靠中小学和大学。但重要的是把能干的年轻人派到国外去：已经有一万多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在德国大概有一千人。企业自己也培养年轻的经营管理人员。施密特插话说：“我在中国各地访问过程中会见了一些厂长，他们使我感到意外的年轻，比在欧洲的厂长年轻得多。”

邓小平证实了他的观察并补充说：“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年轻人送到领导岗位上！应当从全国筛选有才干的年轻人。在一九七八年的三中全会上，我们通过了一系列大胆的决议解决了农业经济问题。新的农业政策已实行了六年，你看到了成果。随着实行新的开放的经济政策，我们将进行一个试验，即把农村的经济推广到城市。当然，城市的经济问题要复杂得多……”

“自然，中国今后也必须继续把精力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因为那里生活着我国五分之四的人口。我们必须设法防止他们流入城市。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把很多青年人从城市送到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工作岗位，所以他们又回来了。”

“如果我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失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欧洲的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中国每年增加七百万人或八百万人，他们都需要劳动岗位。待业是中国的中心问题。所以我们建立了新的企业，从而也就创造了新的劳动岗位。但正是为了这点，

必须使我们的经济体制更具有灵活性。因此，我们也鼓励企业不断开发新的生产领域，包括合作企业和私有企业……”

施密特又提到一般的通货膨胀危险，特别是当前的通货膨胀率。

邓小平的回答有很浓的乐观主义色彩，他说：“我不相信中国有通货膨胀。但即将通过的关于价格体制和工资改革的决议当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通货膨胀问题。”施密特指出，中国领导在今后一个时期会面临一系列更加困难的问题。”但愿你们到时又能得心应手地解决困难！我祝贺你们抓经济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我知道，我掌握的经济知识很少，”邓小平回答说，“我只是为实行灵活的政策提出了一般性建议，而实现这个建议是其他人的

任务，不过他们在改革中将得到我的全力支持。我相信改革是必要的。迄今在执行新政策中取得的成就证明我是对的。这些成就首先证明，没有我，其他负责人照样能干。我想，三年以后城市的变化也会明显起来。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安，整个方向不合他们的意。要消除他们的忧虑，中国需要三年时间……”

几天后，施密特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阅兵。

邓小平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几十万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讲了七八分钟的话。

随后，邓小平站在一辆敞篷车上接受司令员的报告。接着，他检阅了集合在长安街上的队伍；他大声呼喊致意和接受雷鸣般的回答。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时，阅兵式开始了，世界上恐怕没有别的军队能比这次阅兵表演更加精确。

9. 给美国人一个强硬的回答

八十年代初，中美刚刚建交后不久，世界上某些人对中国有一些轻漫的议论，说什么中国又穷又弱，在世界上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中美建交是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认为只要美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中国就可以吞下去。

面对如此议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讲了一番十分硬气的话，坚决有力地回击了世界上对中国的轻蔑之词。邓小平说：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好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穷，装备也确实是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的。过去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议论。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有不少这样的代表团和那样的代表团往美国跑，我们没有控制住，而一些代表团的言论行动又不谨慎。本来去访问不是坏事，是好事，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人。不但在美国，在欧洲也可能有这样的反映。今后我们派代表团要控制一下，当然不是说正常的来往不需要发展。最近我们正在进行经济调整。我们敢于公布财政赤字，表明我们还有某种自信。通过调整，今年我们的财政收支可以基本达到平衡。日本朋友说，他们从来不相信用控制的方法能够达到财政收支平衡。我们可以办到，而且我们还进一步确定，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最典型的是我们在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

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最近荷兰发生了一件事，说是荷兰的公司搞的，准备同台湾签订合同，为台湾制造两艘潜艇。荷兰政府当然干预了这件事。其实荷兰政府搞这笔交易是得到某些人支持的。我们正在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荷兰不改变这个决定，中国同荷兰的关系肯定要倒退。当然，我们还做一点工作，希望荷兰改变它的立场，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议会是以微弱多数通过这个决定的，因此，改变这笔交易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果做了工作以后不行，那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希望在中美之间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情。既然中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的那末，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

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是使它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

我重复说，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邓小平的这番谈话讲得可谓堂堂正正，傲骨铮铮。面对美国一些人和报纸的轻蔑与歪曲，他以坚定有力，准确无误的话语给予了回击。邓小平的谈话显示了一种高度的自尊，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它是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振奋的。中国要发展要对外开放，但如果有人想借此机会期负我们那是决不允许的。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历来都没有风平浪静过，台湾问题一直是个焦点。美国一些人认为，只要美国政府的政策强硬，中国就可以作出些让步，但邓小平义正辞严他说：“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这话讲得真是太妙了！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霸权主义的威风，真是痛快淋漓，石破天惊。

10. “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讲过这样一段话：“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

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邓小平的这段话是讲得十分高明的，它是一个智者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产物，是极为英明的金玉之言。我们知道，中国历来都反对霸权主义，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这样几个原则：一是反对霸权主义；二是维护世界和平；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基于这样的原则，所以我们不能当头头。因为当了头头就难免有指手划脚之时，就难免有居高临下之态，这样是不利于团结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同时，当头头也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有时候头头必须出来平息争端，有时候它又要出力为别人排忧解难。正常的国际援助是应该的，但过多地卷入国际争端与事务之中，必将消耗自身的力量，影响自身的发展。中国现在本来就不够强大，若再在国际事务中大包大揽，肯定是弊多利少的。另外，当了第三世界的头头，就得领导这些国家去同发达国家，超级大国相对抗，若真的这样，中国就无法独立自主地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无法在处理大国关系时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所以，邓小平说我们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这真是一句具有远见卓识的话。这句话反映了一个超凡的谋略，是大智大慧的结晶。

11. 妙语化解紧张气氛

邓小平 1984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曾说过：

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吧。

1978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4 点，一次举世瞩目的记者招待会在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拉开了序幕。

邓小平面对 400 多名记者侃侃而谈，妙语如珠。

当日本记者提出了钓鱼岛的归属权时，邓小平神态自若地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

本来，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微妙问题时，会场内刹那间紧张了起来，但当邓小平以如此巧妙而充满中国式智慧的气氛语言回答了这一问题后，会场的气氛又轻松起来了。

12. “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

人所共知，中印之间曾发生过一次短暂而不愉快的边境战争。然而时间如梭，转眼已是1982年。就在这一年的10月22日，邓小平会见了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会见时，邓小平本着一切问题向前看的原则，以一个具有伟大胸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口吻对来访的印度朋友谈了中国政府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

邓小平心平气和对他说道：

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人口最多，加起来有十七亿，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我们两国又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在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合作得很好。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所公认。

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一九七九年我见到你们的前外长时就讲过“一揽子解决”，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我相信，我们之间最终是会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

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问题。当然，南北问题也应解决。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中国有句话：愈富的人愈吝啬。要富国多拿点钱出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所以，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这种合作总能解决一些问题。这些年来第三世界有一些发展，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相互交流和合作。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

13. “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 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1986年9月2日这天，邓小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面对华莱士各种敏感的提问，邓小平从容道来，表现出一代伟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风度与口才。

下面是邓小平答华莱士的提问：

迈克·华莱士：邓主任，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迈：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邓：没有。

迈：您是否想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你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邓：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迈：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邓：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一百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迈：所以，就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邓：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迈：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邓：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迈：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邓：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迈：具体他说，哪一件事应该放在第一位做呢？

邓：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

迈：是指越南在柬埔寨的军队吗？

邓：是的。

迈：里根总统和夫人对我的节目很有兴趣，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看这个节目，在我的采访节目播出时，他们一定会观看。不知你有什么话对里根总统说？

邓：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迈：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

邓：有。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五十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

迈：美国在处理美台关系时是否未能按照它承担的义务去做？

邓：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明智的态度。

迈：什么态度？

邓：很遗憾他说，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呢？

邓：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迈：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

迈：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您是否

了解这些情况？

邓：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同西方做生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还要加以解决。作为领导来说，要摸清情况，采取措施，包括教育干部。

迈：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他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迈：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我看到现在农民生活得很好，有摩托车、彩电，自己盖新房。你们采取措施，鼓励他们致富。他们把一部分收入交给国家，其余部分归自己。这跟我们的制度差不多，我们的人交完税，其余的就归自己。

邓：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现在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一万元不过二三千美元，还是一年的收入，能够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那能有多少？比起发达国家来，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

迈：邓主任刚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

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

邓：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了。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迈：还有两个问题。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

邓：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

迈：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邓：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迈：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迈：但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邓：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迈：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迈：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一九八五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

邓：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14. 坦言相告，余味无穷 ——与戈尔巴乔夫谈中苏关系

早在六十年代，邓小平和苏联首脑赫鲁晓夫之间就有一场著名的舌战。当时邓小平谈吐机敏，很有威力，被赫氏称作“很难对付的小个子。”自那之后不久，中苏关系恶化了，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讲坛上向全世界说：“在欺侮他国上，那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超级大国更为凶恶。”

岁月流逝，世事多变。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苏关系又有了缓和的迹象。八十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中国走在了前面，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贸易活动开始恢复了，从1982年至1986年，两国贸易增长了六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很想进一步与中国改善关系。1989年5月，56岁的戈尔巴乔夫来到了北京，会见了86岁的邓小平，这是中苏两国领导人在长达30年的脱离接触之后的第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邓小平讲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话，显示了他出色的外交口才。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对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他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九三二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的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

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

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由于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在隔断三十年后，两国之间要重新交往起来，就应该十分谨慎而有原则。邓小平的外交口才是十分出色的，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他首先谈了历史上英、日、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损害，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他直言不讳他说：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土地超过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这是毫不客气地当着戈尔巴乔夫算了一下两国的旧帐。旧帐不能不算，两国要重新往来，发展关系，过去的事情还是说清楚为好。而俄国人过去欺侮我们，让我们受的气也不能白白吞下去，所以，邓小平旗帜鲜明，冷静客观他讲了俄国过去对中国的损害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当然，讲过去也是为了未来，所以他又说：他讲这些看法，不要求回

答，也不要要求辩论，只是想使苏联同志知道中国是怎样认识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这些话说得十分明智，十分有分寸，它们既体现了我国政府与苏联发展关系上的积极态度，同时又能在暗中制约苏联人，让他们今后在与我们打交道时不要旧调重弹，要更公正，更平等，更合理一些。因此，邓小平的这些话是讲得十分高妙的，它看似寻常但却意味无穷，效力无穷，没有非凡的外交天才和谈话艺术是讲不出这样一番话来的。

15. 中国有句话，叫做“愚公移山”， 你们称得上“愚公移海”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荷兰首相吕贝尔斯。二人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对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非常风趣地说：

我没有去过你们的国家，听说荷兰不少土地是填海造出来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了不起。中国有句话，叫做“愚公移山”，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你们称得上是“愚公移海”。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上是比较少的，你们比我们更少，但是搞得很好，成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经过这么一个轻松自然、充满机趣的开场白之后，邓小平开始给客人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接着还谈到了国际形势，以及对欧洲的希望。邓小平说：

欢迎你第二次到中国来。一九七三年你来访问的时候，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到现在的八年多时间，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走了第一步。我们确定一心一意搞建设是正确的。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这也是正确的。这八年多只是开始起步，虽然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成就，但是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就是再过十三年，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水平。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我们两国的观点一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險。我们感觉，欧洲比较开放一些，特别是技术上开放，我们比较满意，当然不是完全满意。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对荷兰，对整个欧洲共同体的

政策都是一样的。我们同东欧也在发展关系，这是我们的新方针。

邓小平的谈话实在妥当，不仅具有外交口才的艺术性，而且也给荷兰首相说明了我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欧洲的政策。

16. “ 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 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

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语重心长地谈到了中美关系，并希望两国之间要好起来才行。

邓小平说：

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尽快解决六月以来中美之间发生的这些问题，使中美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取得新的前进，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

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此节谈话中的最后一句，使我们感到邓小平博大的胸怀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殷切期望。他说自己是东方的中国的一位退休老人，不仅富有诗意，同时也充满了感情。因为正是这样一位非凡的但又具有平常心的老人，在关注着中美两国的关系。

17. 与拉吉夫·甘地纵论国际新秩序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

在会见中，邓小平谈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邓小平诚恳地说道：

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印两国共有十八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我们两国是上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行列里的最大的队伍。

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和加拿大包括进去，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变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五十到七十年时间内发展起来。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这是我国政府的想法。

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

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

遵循这些原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两国同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我提出这一建议，请阁下考虑。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我想，我们就首先在阁下来访的新闻公报中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我想你们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

四、统战口才

1. “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 没有关系”

统一战线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十分重视它，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它。

早在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就专门谈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邓小平以一个谦虚的开场白，展开了他的统战口才。

他先谈了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接着又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种类以及历史状况。

邓小平说：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根深蒂固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谈完宏观再谈具体，邓小平又说：

我想讲点西康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

除了恰切的口才之外，邓小平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掌握得也是非常分寸的。

接着邓小平讲了：“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

如何开展工作呢？邓小平以“急性病”与“慢性病”来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他说：

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

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

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使邓小平的统战口才具有了可感性，而且让我们体会得也更加深刻。一句话，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而这两种“病”的辩证关系，邓小平也说得清清楚楚。他所讲的不要患急性病，并非是睡大觉式的慢慢来，而是稳步向前。民族工作如果这样做，就掌握了节奏并一定能做好。

2. “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这是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句开场白。

这个开场白非常好，是大口才家的作派。语调平缓而内力深厚，给人一种静水流深的感觉。

紧接着，邓小平就点出了这个不平凡的原因：

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这三点的确是非凡的，它已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其中尤其是第三点更加显得重要，因为邓小平已经把台湾问题提到了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在这不平凡的一天，邓小平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他简洁明快，重点突出地回顾了上一年的工作成绩，并以此来勉励自己也激发大家继续努力。

邓小平意气风发地说道：

去年我国的生产形势很好，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情况要好得多。这是与我们认真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分不开的。更值得高兴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举国上下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局面。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开来、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开来，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认识，缺乏经验，需要好好学习，加倍努力。我们还要看到，在有些事情上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某些方面还会有困难。但是，只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善于学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的事业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去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委员对当前形势是高兴的和乐观的，也是乐意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这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天，邓小平以他平实而稳隍的口才回忆了过去不平

凡的一年。同时，这一天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邓公出语干净利落，铁娘子不慎跌了一跤

当今世界，香港拥有相当重要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然而对于中国来说，香港却是世界唯一特殊而且矛盾的地方，它既是一粒明珠，又是一种耻辱。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香港就归了英国管辖，租期 99 年。

然而归期就要临近了。1997 年，中国就将收回主权。

从 80 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加快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步伐。邓小平运筹帷幄，提出了他关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的大构思，也就是后来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统战谋略。

1982 年 9 月 16 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开始了她的远东之行。9 月 22 日下午撒切尔夫人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并于当天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在钓鱼台国家馆，撒切尔夫人住进了第十二号楼。第十二号楼的总统套房分总统和夫人的卧室，都在二层，各有五十多平方米。撒切尔夫人与一般女性不同，她喜欢那男性味十足的总统卧室，让她的随从住在女性色彩强烈的粉色的夫人卧室，她喜欢睡在龙床上，龙床上雕着一百一十六条姿态各异的龙，是仿明代皇宫龙床复制而成，总重量达一点二吨，厚重的暖阁足以让享用它的主人发思古之幽情。

推开窗户，可以看到她十分熟悉的一百多棵欧洲甜樱桃树，还有荷兰、法国的温室花卉，一片生机盎然。

在北京，撒切尔夫人的生活是十分愉快的，钓鱼台国宾馆的接待服务无微不至，可是，与中国领导人谈到香港问题时，撒切尔夫人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在中英会谈以前，有些人以为目前的香港状况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人不可一日无香港，因为，目前中国每年可以从香港得到近百亿美元的外贸收入，香港协助中国引进外资、科技、管理技术，一旦战争爆发，香港又可以成为中国的后勤生命线。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佳办法，是北京同伦敦续约三十年至五十年。

北京收回香港主权，形势基本已定，连英国伦敦上议院内固执坚持 3 项不平等条约的言论也已经渐趋于沉寂，大家都觉得鸦片战争的名声已经是太臭了，代之而起的是不少议员主张承认北京拥有香港的主权，以换取英国人将来在香港以及对华贸易方面的最大利益。

第二天会谈之前，中国总理特地比撒切尔夫提前五分钟到场，主动与香港记者谈天，香港记者十分高兴，赶紧抓住这难逢的良机问这问那，最想问的当然还是香港的将来，得到的回答是“主权问题当然中国是要收回的。”“如果中国收回主权，一定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走。”

显然，这是有意无意地向香港记者吹风，使他们知道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意向，邓小平已有坚定的决心，他说，我们不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人民会骂我们腐败无能，是李鸿章！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撒切尔夫人坚持“不平等条约有效论”，坚持十九世纪英国迫使中国缔结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按照国际法是有效的。认为这三个条约可以修改，却拒绝承认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还大谈特谈英国对香港市民“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对此，中国方面理直气壮地予以拒绝。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进行了摊牌性

接触，却没有进行激烈争论。

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进行关键性谈判。

撒切尔夫人是富有外交斗争经验的政治家，她深受领导英国在二次大战中取胜的首相丘吉尔的影响，在国际事物中采取维护英国利益的强硬路线，有“铁娘子”之称。她此次前来中国谈判香港问题，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只见她身穿一袭蓝底红点丝质西装衣裙，脚踏黑色高跟鞋，一条金光闪闪的珍珠项链端挂在颈项下面，腕戴一副镶有五光十色宝石的手镯，那是丈夫丹尼斯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手挽黑色提包，更显得雍容华贵，气度不凡，真不像五十二岁的人，中外记者无不啧啧称赞。

撒切尔夫人先来到人民大会堂珊瑚厅，与邓颖超亲切会面。邓颖超以令人敬仰的传奇革命经历，质朴和蔼的风度给英国贵宾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位举世闻名的女政治家倾谈片刻。撒切尔夫人旋即告辞，前往对面的福建厅，去跟邓小平进行关键性的谈判。撒切尔夫人在中国外交官引导下迈步前行，出于女人的特别细心和多年的出访经验不见邓小平外出迎接的身影，与刚才邓颖超在新疆厅外早就伫立恭候的情景截然不同，宽阔的前额不由皱起了眉头。

突然，在距福建厅二十步左右时，邓小平神采奕奕健步走上前来，彬彬有礼地与撒切尔夫人握手问好。记者们一拥而上。撒切尔夫人笑着对迎上前来的邓小平风度十足地说：“我作为英国现任首

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邓小平晓得这位首相在香港问题上的观点，意味深长地回答道：“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位，但我认识的几位现在都下台了，欢迎来呀！”

“铁娘子”马上听出了邓小平弦外之音，知道这耐人寻味的大实话预示着今天谈判的艰难曲折，必须小心才是。有的记者暗自好笑，对此次会谈兴趣盎然，等着有好戏看，都把目光投向英国女首相，看她对邓小平寓意深刻的话做何反应。

只见撒切尔夫人客光焕发，仪态万千，在邓小平陪同下进入福建厅、坐在指给自己的沙发上紧张地正襟危坐，双手放在两膝上，准备迎接关键性的“战斗”。

铁娘子斜眼一看邓小平，只见他半靠在沙发上，笑容满面，轻松舒恰，面对大批记者拍照，不慌不忙地与自己寒暄，津津有味地大谈饮食之道，更感此人深不可测，便以优雅的风度主动客气地说：

“知道你很忙，刚从外地回来。”

邓小平坦率地回答道：“我是陪同北朝鲜主席金日成去了四川。”

记者退席之后，两人即转入正式会谈。

撒切尔夫人对在前哨战中处于下风很不甘心，正式会谈一开始就大讲特讲香港在英国治理之下，已由荒山野岭变成了名闻世界的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香港今后要繁荣就仍要由英国治理。

邓小平对此早已在预料之中，见“铁娘子”仍不愿放弃帝国主义的侵华产物，不肯将香港拱手奉还，神情格外严肃起来，斩截铁地回答：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撒切尔夫人见邓小平如此干净利索、不容置疑地把中华民族坚决收回香港主权的鲜明立场昭告于世，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威武庄严，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邓小平明亮的眼光注视着客人，直率地说：

“香港问题很简单，我看一二年能解决。中国政府有三点原则性意见：第一，主权不容讨论，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二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撒切尔夫人此时无法正面反驳，只是气鼓鼓地一个劲儿强调，香港繁荣必须取得英国的合作。对此，邓不平毫不含糊地驳斥说：

“到一九九七年，中国要收回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的主权，这一点是肯定的，不能有别的选择。至于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主权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制度，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总之，香港仍是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撒切尔夫人见中国方面态度如此坚决，邓小平讲得又合情合理，只得同意本着维护香港繁荣和稳走的共同目的，两国通过外交途径继续商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阶段会谈至此结束。

再说香港记者被请出福建厅后很不甘心，便等在大会堂北门外。

香港记者见撒切尔夫人从人民大会堂北门口走了出来，脸上露出落寞凝重的神情，慢腾腾步下台阶。她忽然抬头看见台阶右下方有记者迎候，马上露出动人的微笑，热情地与香港记者招手致意。

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件：在“铁娘子”下到倒数第二道台阶时，高跟鞋同阶石相绊，一下失去平衡，差点栽倒在地上。

众人见状大惊，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和两名工作人员不约而同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起将“铁娘子”扶起。另一个工作人员抬起手提包和高跟鞋，轻轻拍拍土，迅速递了过去。

撒切尔夫人处变不惊，神态自若地道声谢，先穿上高跟鞋，再接过手提包从容不迫地转身猫腰钻进轿车内，微笑着向记者招手告别。

九月二十七日，撒切尔夫人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又说：“虽然中国领导人向我表示，不承认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但英国方面却一定要承认，因为这些条约是有法律根据的。”

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傲慢言论，中国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严正指出：

“撒切尔夫人九月二十七日在香港谈话中称，三项条约是有效的，应该继续遵守。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香港是事关十亿中国人民（包括香港的中国居民）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大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有权利说，对香港的中国居民负有一个主权国家的责任。”

这时，英国当局搞了个小动作，让港币汇率指数在十月二十日跌至七十九点七，为空前最低点；香港外汇市场每一百美元兑港币六百九十四元，创二次大战后的最高纪录。

对此，香港经济评论家一针见血地道破英国当局的真正谜底：主要是英资财团从中操纵，企图影响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

中国政府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被英资财团的威胁所动，廖承志副委员长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会见以黄鉴为首的香港厂商联合会参观访问团时，阐明了中国对香港未来的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收回主权，港人治港，制度不变，保持繁荣。

这样一来，“港人治港”一时成为香港报刊、舆论的评议中心，成为香港广大社会阶层人士广为谈论的热门话题。

香港当局先在港人治港问题上制造障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李鹏飞率专业人士代表团一九八三年六月访问北京，宣传港人治港方案难以维持香港繁荣，受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港英当局见反对港人治港方案难以奏效，又指使香港市政局主席张有兴出面表示：“港人治港原则可行，但应有一段合理过渡期，可定为一九九七年后三十年。

邓小平见英国和港英当局不断制造障碍，毅然决然地在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会见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政协委员们时表示：

“由于英国坚持三项不平等条约有效，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实际上无从开展，陷于停顿，但时间不等人，如果中英会谈在一九八四年九月仍无法达成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只得做出让步。

4. “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光阴似箭，转眼两年过去了。1984年12月18日晚8点20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行又乘专机飞抵北京。

12月19日下午5点30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

签字仪式结束后，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论天说地，谈笑风生。邓小平颇有感慨地说：

“香港问题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一片光明。”

撒切尔夫人被邓小平幽默乐观的憎绪所感染，风度优雅地微笑着：表示对邓小平的这一评价完全赞成。她怀着对邓小平的崇敬之情说：

“回顾我两年多以前初次在这里同您见面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双方的了解也加深了。阁下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

邓小平谦逊地摆摆手，充满活力与自信地说：“这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构想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而这个构想也只有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才能提出。两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构想是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是否会忠实地执行这个协议，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在撒切尔夫人问香港的现行制度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保持五十年不变的设想时，邓小平说：

“这一设想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它的根据是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和 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中国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之后还要用几十年时间才能达到真正发达起来的目标，因此对外开放政策在下个世纪是不会改变的。”

中英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受到香港同胞的衷心拥护，认为“一国两制”构想符合时代需要，有利于香港的和平过渡，有利于香港的繁荣，亦有利于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

5. “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第一次谈到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这个设想是邓小平统战思想的一着妙棋，他对问题考虑得十分详尽，话也说得十分实在。

邓小平说：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我们希望台湾方面仔细研究一下一九八一年九月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内容和一九八三年六月邓颖超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消除误解。

你们今年三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

我们已经实现了安定团结。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将坚持不变。

中美关系最近略有好转，但是，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

6. “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再一次提到了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可谓语重心长，入情入理。

邓小平说：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这是随便谈谈脑子里转的问题。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有些话不一定准确，可能考虑不周到，但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7. 并非感情冲动的“一国两制”

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唐翔千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

在这两次会见中，邓小平再一次以他卓越的统战口才深入地阐释了他“一国两制”的深刻思想：

邓小平说：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部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

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

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我们对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国务院总理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是经大会通过的，是很严肃的事。如果现在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末，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

8. 邓小平坦言解疙瘩的妙法

1984年7月31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

二人在一阵简单的寒暄之后，就立即进入了正题。

邓小平坦率地对豪说：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

豪一边听一边点头。

邓小平接着将话题引入具体问题上面。他说道：

坦率地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一九九七年后的事情。我们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今后中英两国要更好地合作。

现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了。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听完邓小平这席话，豪一行不得不佩服邓小平清晰的头脑、恢宏的心胸以及对香港问题如此细致入微的意见。

9. “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

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的全体成员。

这天，邓小平的兴致非常好，谈起话来极富感染力，而且也十分实在（说话实在是邓小平口才的一大特征）。

首先，他说：

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三年和十三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一九九七年以后，在座的六七十岁的人，那时精力就差了，但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年轻人有优势。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接着他又妙趣横生地说：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变的，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央全会，讨论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似地的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勿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

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想，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三日，一夜之间换一套人马。如果那样，新班子换上来，什么都不熟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即使不造成动乱，也会造成混乱。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一个是怕变，一个是怕干预，还怕什么？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邓小平的讲话句句入理，完全打动了港澳同胞的内心。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拍起手来，接见大厅里回荡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10. “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从前面我们已经知道，邓小平在 1982 年 9 月 24 日时曾对撒切尔夫人明确地表示过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邓小平的谈话非常坚定、严肃。

他干净利落地说过：

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二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在第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而当时撒切尔夫人却说，我国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从容而勇敢地回答说：

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不仅在这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不要发生大的波动，一九九七年中国接管以后还要管理得更好。

1984 年 12 月 19 日，当中英签定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后，邓小平再次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是信守诺言的”。

接着，邓小平还真诚地阐释了“50 年不变”的道理。众人皆知西方谚语里有“诚实是最好的武器”一说，而邓小平的这番阐释正好是最诚实的口才，当然就是最好的口才。

邓小平款款说道：

一位日本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还有一个“五十年”，即一九九七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你们根据的是什么，是否有个什么想法？我对他说，有。这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十年内，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走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到下一

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我还对日本朋友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最后，邓小平还言简意赅、逻辑严密地对撒切尔首相再次阐释了“一国两制”的内容及意义。邓小平说道：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11. “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1987年4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精神抖擞、满面含笑地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

“今天没有别的，同大家见见面，快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了，应该对你们道声辛苦嘛！”

邓小平亲切的问候，一下拉近了和委员们的关系，大家的心相通了，气氛也热烈了起来。

接着，邓小平说：

你们委员会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靠大家的辛苦、智慧，工作进展是顺利的，合作是好的，这样香港会过渡得更好。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万亿美元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198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走。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这么迅速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三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我刚才说，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比。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

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还要讲一个不变。大家对于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一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说是不是在变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面对香港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邓小平信心百倍地谈论未来，并坚定地讲：“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然而回首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的反复谈判、的确如国际社会所说是：“慑人心魄的反复较量”。

早在 1975 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希思访华时就曾问过毛泽东将来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毛泽东说，反正要到 1997 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1979 年 3 月下旬，英国驻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香港问题。3

月 29 日，邓小平接见了麦里浩，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方针，这个方针实际上已经明确表示了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从此，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就沿着邓小平“一国两制”这一创造性的构想向前推进。

转眼又到了 1990 年。这一年的 2 月 17 日，邓小平再次会见了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在这次会见时，邓小平发表了充满激情、感怀和理性的简短讲话。这番话讲得非常震动人心，同时也具有历史意义。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

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

12. “当然见，明天就见，在人民大会堂见”

1986年6月的北京，天空晴朗、阳光炙热，邓小平正在室内看着教委的报告，想着如何让中国的教育和科技更上层楼。这时，秘书进来说：“荣氏亲属观光团已到北京了，你见不见？”

邓小平高兴地说：“已经来了？当然见，明天就见，在人民大会堂见。气氛要热烈，场面要隆重。”

的确，荣氏亲属此刻正沉浸在团聚的欢乐之中。他们是6月15日到北京的，200多人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瑞士，200多位荣氏亲属在大哥荣尔仁的率领下已从世界各地乘飞机到了北京，下榻于香山饭店。

6月18日，荣氏亲属探亲团200多人和荣毅仁一家按时坐车来到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很快出来和大家见面了。

荣毅仁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的大哥荣尔仁。邓小平问他：“高寿？”荣尔仁说：“今年79岁，比邓主任小好几岁哩。”

接着，邓小平招呼大家坐下，让大家喝茶，自己靠在沙发上点了支烟。然后高兴地说道：

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至于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你们有本领、有知识，是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你们联系的人多，朋友多，希望你们跟他们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让他们回来看看，看一次不够，看几次就比较了解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是怎样前进的。现在我们有些条件还不怎么好，这不要紧，以后会逐步改善。

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2000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国家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比如，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办教育，就是五百亿美元，现在才七八十亿美元。如果拿出百分之五去搞国防，军费就可观了，但是我们不打算这样搞，因为我们不参加军备竞赛，总收入要更多地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

邓小平谈兴很浓，他从荣家谈到中国的未来。接着，还谈了我国的对外政策。

邓小平说：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

我们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我相信在国外的华侨、华人是会热心支持我国的建设事业的。

13. 与卡特谈西藏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卡特，二人进行了亲切、坦率的谈话。邓小平纵论天下风云，一会儿国内、一会国外。当卡特问及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问题时，邓小平从容而坦然地说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国有几十个民族，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行政机构中少数民族干部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百分之六。至于说“文化大革命”使少数民族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不能表明我们歧视少数民族。那时不仅损害了少数民族，受害最大的还是汉族，大多数老一辈的革命家都被打倒了嘛，这些人几乎都是汉族嘛，包括我在内。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目前西藏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善，但总的讲还是处于落后状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如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广大的草原，人口又不多，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那里有不少汉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坏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

14. “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1990年4月7日，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一行来北京访问。邓小平会见了他们，并与谢国民一行纵论了国内国际形势，提出了要“振兴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口号。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谢国民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已经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级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去年发生动乱，当时我们控制了局势，这是完全必要的。我曾经请人转告布什总统，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三十亿人口，中国大陆就占十一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当然没有印度的发展也形不成。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大家都应该想开点。我们已经想开了，提出“一国两制”。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联合国的席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大陆虽然人均收入水平低，但并不是样样都落后。比如钢铁，年产量已经达到六千万吨，还有太空领域和其他领域高科技的发展，中国发射卫星的成功率很高。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虽然科学家研究条件差，生活待遇不高，但他们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最后，邓小平以热情的口才向全球华人发出了召唤：

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15. “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

1990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再次谈到了祖国统一的问题。

邓小平通过郭向台湾打招呼：

台湾方面最近开始有些松动。但是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现在联合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

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16. 处于伟大时代，做着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对新的历史时期的统战工作予以了高度的重视，认为它依然是我党的一个大法宝。

邓小平的这篇精采的讲话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统战工作的纲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下面就是他那天讲话的原文：

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推动和帮助各自的成员以及所联系的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也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相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人们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同志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同志是学有专长的专门家，他们都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原工商业者中不少人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营企业和做经济工作的经验，在调整国民经济、搞好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也能够利用自己的专长和社会关系，在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中作出自己的有益贡献。目前，在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积极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还有一些困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各民主党派协同党和政府，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在

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骨肉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所面临的一项光荣的神圣的任务。我国政府公布的对台湾回归祖国的大政方针，充分考虑了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处境、利益和前途，是完全公平合理的。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现在，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我们希望同台湾当局共同为祖国的统一携手迈进。台湾同胞富有爱国传统，一定能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宝贵贡献。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中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希望你们在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的事业中，积极贡献力量。

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任何困难都挡不住我们前进，任何阻力都将被我们打破。我们的事业一定要胜利，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努力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实现四化的促进派，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促进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共同奋斗！

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一锤定音，直接点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从中可见邓小平的统战策略是非常高超的。

五、军事口才

1. 不但要武装手足，还要武装头脑。

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时年还不到34岁，但他已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与组织才华了。他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配合默契，挥师杀敌，联手创建了后来名扬天下的“刘邓大军”。

然而就在这一年的1月12日，邓小平发表了他的一篇重要军事文章《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在此文中，他透出了一种敏锐的政治直觉和军事直觉。他一开篇就谈道：

“当前的战局，是处于暂时的局部的失利的境况，决不是抗日自卫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

今天的战争，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半年抗战的宝贵经验。不仅应研究战略战术，而且还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邓小平的军事观点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在此我们还可以见出邓小平口才及行文方面的一个特点：厚实、稳重、言简意赅。虽不象毛泽东口才那样神采飞扬，具有诗意，但有一句就是一句，同样切中要害。

邓小平不但对抗日战争持“持久战”的观点，同时也注意到战争中“兵源”这个大问题的。

接下来，邓小平以他具有彻底说服力的口才谈了征兵的实际困难。首先是由于历史上“好子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其次是由于对民众缺乏民族的教育特别是抗日的教育，第三是征调壮丁的方式还存在强迫的错误，最后是对抗日军人家属的困难没有给予解决。

邓小平谈话的逻辑性非常强。他层层道来，先摆出问题，然后再谈如何解决之办法。

邓小平从容道来：

必须了解，全国民众对日寇的侵略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能采取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动他们，必定能够很快地打破部分民众中的不健康的心理，必定能够鼓起他们最大的决心与勇气，自动地奔上前线，鼓励自己的夫、子、兄、弟上前线，为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这从某些区域进行动员工作收到显著成绩的例子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出来。

这些动员较好的区域，给我们显示出了一些可贵的经验。

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

在那里，进行了团结抗日积极分子与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分子（不是投机想升官发财的那些人）的工作，经过他们去进行招募，常常收效极大。

在那里，进行了抗日军人家属中的工作，召集了各军军人的家属开会，有可能时甚至举行会餐，向他们宣传解释各种抗日的问题，说明他们的光荣，

给以光荣牌匾，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困难，已在可能的范围内，向当地政府或民众团体提出意见，求得部分的解决。这些工作的结果，给了一切人民以抗日军人家属光荣的榜样，创造了不少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哥哥送弟弟参加军队的新模范。

在那里，动员了政府和民众团体，来协同地进行这一工作，推动了这些组织进行宣传、慰劳与欢迎新兵上前线的工作。

在那里，驻扎的军队，首先起到了模范的作用。军队本身有了模范的纪律，与民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举行军民联欢晚会，请民众吃饭（常是以连队为单位每家请一人代表）。这些工作给了民众以最切实的影响，使他们从经验中改变了惧怕军队的心理和“好子不当兵”的观念，给了政府与军队招募新兵以便利。

在那里，军队中已动员了自己的战士去进行招募工作。只要保证自己的战士不会扰民，态度和蔼，所收成绩常常是可观的。

最后，在那里，有些地区是处在敌人的后方侧翼，或者处在时常被敌侵扰的范围内，他们充分地运用了组织游击队的方式，动员敌人后方我接敌区域的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些游击队本身的壮大与战斗力的增强，还逐渐成为正规的劲旅，实际上扩大了国防的力量；甚至在可能的时机，在不妨害与削弱游击战争的开展之条件下，还可动员一些游击部队加入正规的军队。这一方式的运用，在今天不少领土变为敌人后方的条件下特别重要，既是增强国防军队的一种良好手段，在持久抗战的战略上更有极伟大的意义。

我们热望全国一切军队能够得到适时的补充与扩大。在全国的征兵制还没有可能实施以前，我们盼望政府和军队都能运用这些经验。固然这些经验仍然是不充分的，但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式，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

邓小平谈征兵工作并非干巴巴的说教，而是让思想附在生动有力的口才上，从而达到了“动员新兵”的目的。

同时，邓小平考虑问题十分全面，动员了新兵和还想到了如何搞好新兵的政治工作，因为只有这样的新兵才能成为一支真正的铁甲之师。

邓小平以十分形象的话说道：“我们不仅要武装战士的手足，尤其重要的是武装战士的头脑。……新兵动员方式的改善，与部队政治工作的加强，将配合着战略战术的进步，锻炼出最大数量的、有优良技术的、有最高战斗力量的国防军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了邓小平的建军思想，还看到了他对一支现代化军队的憧憬与期望。

2. “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充分领略了他的军事思想同时也欣赏到了他的军事口才。

邓小平在总论了“我们的对敌斗争”之后，立即切入“小结”，并引出他十分具体的一些战法。

首先，他从宏观上论述了敌我双方的较量，提出了“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此话说得何等精道！斗智才是最聪明的兵法，邓小平一语为我们点破。

接着他谈得更为周详，为我们实实在在地指出：

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过去我们对此原则认识不够，常常发生暴露自己的错误，每次暴露的结果，都遭到敌人的报复或破坏，吃亏很大。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惟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敌人也很注意隐蔽问题，如敌一一师团的文件即曾提出“不震荡敌人，不刺激敌人，突然的跃进”的策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而收到了效果（如每次“扫荡”、蚕食前的准备），故我们一方面要隐蔽自己，一方面也要善于发现敌人。

这是十分精明的兵法，邓小平运用他逻辑严密的口才为我们讲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邓小平又谈了敌我斗争中敌进我进、游击战以及一元化的兵法。

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战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扫荡”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扫荡”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扫荡”斗争，以取得主动。“敌进我进”的斗争，也表现于隐蔽斗争上，敌人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和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将是日益发展日益激烈的。总之，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应是今后非常注意的问题。

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由于我们过去对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而在相当期间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重视不够，对地方武装发生了编并和放任两方面的错误，所以影响对敌斗争甚大。这也是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敌强我弱的特点了解不够所致。今后（在反攻之前）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增大，运动战在平原已无可能，在山地也可能缩到很小限度，所以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这方面1942年已获相当成绩，此后还应加强其指导。对于武装的爱护和党员干部的军事化，亦应切实注意。

敌人对我实行“总力战”，我们对敌亦提出了“一元化”的斗争。过去经验证明：一元化实行得好的地方，对敌斗争才有力量；如果内部磨擦，互

相埋怨，结果只会放松或放任对敌斗争，遭受很大的损失。今后应根据中央对敌后根据地统一组织机构的决定，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

3. 邓小平走马上任，打响整顿“第一炮”

1975年1月25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复出后不久的邓小平来到了总参谋部机关，向团以上的干部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邓小平此时依然像过去那样，讲起话来不作任何“客套”，直接就切入问题的要害。

邓小平说道：“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后，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

“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

“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现在有好多政策没有落实。各个单位要认真研究，把政策落实好，这样才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安定团结。”

“我们总参谋部，顾名思义，就是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给我们军队的统帅毛主席当好参谋。毛泽东同志过去批评总参

不参，这个状况要改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现在是问题成堆。我

们总参谋部一走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路线、建军原则，好好地清理一下，使我们真正起到参谋的作用。

“今天就是同大家见个面。军队究竟怎么搞法，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议。但是我想，刚才说的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这些原则是不会错的。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希望我们总参谋部所有的干部，本着这样的精神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

新年伊始，邓小平走马上任。他一来到总参，就发表了这篇气势非凡、刚劲有力的讲话，从而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紧接着，邓小平在同年7月14日，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更加细致同时风格也更加凌厉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我们

尤其感到了邓小平昔日重来的口才艺术，即实实在在、稳重厚实、生动有力。

邓小平一上来，就单刀直入，说道：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军队还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因为军队受的赞扬太多了，所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当然，全军总的面貌不是这样。但是从部分单位来说，从部分同志来说，是存在这五个字的。

邓小平的意思非常明确，那是要整掉军队中的这5个字。而且首先就必须消肿。

接下来，邓小平从容道来，分门别类将这5个字一一分析得透透彻彻。

在谈到第3个字“骄”字时，邓小平还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使他的口才更加具有形像感与说明力。邓小平说：

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位的，现在有的不lets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从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现在，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

仅用一个战士不让座位，以及一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就活脱脱地烘托出这个“骄”字。口才不在于卖弄，而在于自然而然地流露，邓小平可称运用此法的高手。

讲到“惰”字时，邓小平也十分形像地说：

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这样，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写出来照着稿子念就没有错误？我看起码是文风不好。写的稿子都是照着报纸抄的，那不是八股？

正因为如此，军队所以必须整顿。邓小平此时话锋一转，又谈了“军委的工作”，而核心工作就是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

最后，邓小平还讲了“整编中的干部问题”，以及“高级干部的责任”。要求应在军中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团结。

4. “军七政三”与“政六军四”

邓小平 1977 年 8 月 23 日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曾发表过一篇演讲《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邓小平开门见山，就提出：“四个现代化，有个国防现代化。”接着他又一语荡开，说道：“军队目前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邓小平说：

很多同志担心，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还有同志担心，军队经过林彪、“四人帮”这样久的破坏，如果不很快整顿，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这样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提出一些问题：军队怎样整顿，怎样准备打仗，怎样把军队搞好。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到国防现代化问题。

摆出了问题，就得解决问题，这是邓小平的工作作风，也是他口才艺术的一个特点，因此，他立即紧追问一句：“解决这些问题从何着手呢？”

当然，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包括毛泽东同志讲的交流干部，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九七五年那一次的调整，陷进帮派活动中去的人会更多，受害的干部也会更多。那次调整，保护了一部分干部。但是那次调整的面太窄，还有些应该调整的没有调整，应该交流的没有交流。调整、交流是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倡、多次指示的，本来是应该接着做下去的，我们没有来得及做，就停下来了。

首先是要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谈完此点，邓小平才回到这次谈话真正的主题，即还须从教育训练入手，并且要把这个训练提高到战略的地位来进行。

那么战略训练又怎么去实行呢？

邓小平又谈了两点，一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要大练作风与纪律。二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

接下来，邓小平重点谈如何在军队中办学的问题。

邓小平说：

学校怎么办？我想对学校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像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我曾经讲过，现在当个连长，不是拿着驳壳枪喊个“冲”就行了，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通信联系，你怎么指挥？一个连是这样，更不用说营、团、师、军了。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他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不能像前些年办学校的办法，要讲一点有用的东西。提出这三个要求，够不够？大家研究一下。

邓小平所提出的这三个要求可谓切中了要害，是真正治军的行家里手。

接下来，邓小平议论滔滔，谈了具体如何办军校，怎样选教师，选教材等。而且他特别强调教材的内容要包括现代战争的知识。

不仅如此，邓小平考虑问题十分全面，在招什么样的人进军事院校的问题上，他独有心得。他建议高级学校的学员应以团的干部为主。他强调军队干部“要认真学习军事知识，如飞机、坦克的型号、性能，怎么样对付，诸

军兵种联合作战怎样指挥等等”。

而且，邓小平还以生动的语言说军事学校“教学时间的比例，可以三七开，军七政三。”“政治学校，四六开，政六军四。”语言简洁有力，不拖泥带水，这也是邓小平谈话艺术的一大特点。

5. “消肿”

自从1975年邓小平着手进行军队的整顿时，就提出了要“消肿”。当时，他要整掉5个字（前面已谈到），而第一个就是“肿”字。

问题明摆在那里，军队患上了“肥胖症”，需动手术予以消除。

邓小平在号召搞四个现代化时，其中就有一项国防现代化。而国防现代化之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尖端技术，而不是过去老式战争那样搞人海战术。因此，从这一点上说也需要“消肿”。

1980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总共他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消肿，第二是改革体制，第三是训练，第四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而“消肿”问题又一次首当其冲。

邓小平一上来就单刀直入，说道：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军队“消肿”这个老问题。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一旦有事行不行？或讲的不是像对越自卫还击战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好应付。如果从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来说，衡量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可靠性怎么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比如有好多干部没有打过仗，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装备又比较落后，等等。但是经过对越作战可以看出，勇敢这两个字我们还是有的。军队勇敢，这很好。仗打起来，开始可能吃些亏，经过一段时间情况就会变化，有勇敢这一条，我们就能学会打仗。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这件事在1975年我们就提出过，做了一些工作，也见效，后来由于遇到曲折，停了下来。经过这几年，军队的各级机构又加大了，随之官僚主义现象也发展了起来。现在解决问题很难，好多问题一拖就是好长时间。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还有，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总之，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

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这次的措施比1975年更进了一步。比如，各级指挥员人数，过去保留得多一点，这次要力求少一点。很多同志提议，一个团两个副团长、一个副政委就可以了，这个意见好。师也可以这样做嘛！现在领导班子实在太大。这个问题如果不果断处理，再过几年，不晓得问题会变成什么样子！请大家对比一下1975年和1979年的情况。1975年时，军队要包起来的干部已经相当多了，现在，相隔四年之后，要养起来、要退休的人就更多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下决心解决，再过几年，问题会更多、更大，处理起来会更困难。所以不下这个决心不行了。特别还要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军区一级、军一级、师一级干部，年龄大体差不多，都相当大了。过几年，统统老了，不但不能到军、师工作，到军区、总部工作也不好办。这

是自然规律。在座的同志再过五年怎么样？恐怕到那时不说所有的人，就说大部分人。要坚持工作也困难了。再过七年八年，都七十岁出头了，你还能够在战场上见分晓啊？真正打起仗来，三天三夜不睡觉行不行啊？所以，现在的“消肿”也有利于我们干部的更新。我们下面的干部之所以不上来，就是因为上面盖住了。这不只是军队，地方也一样。今天，主要的岗位还只能由老同志来搞，再过几年总不行了嘛！所以，这次精简要把盖子揭一层，包括团级的、营级的、连级的都要揭，为提拔新生力量创造一个条件。

对减下来的干部，我建议组织各种训练班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准备到哪个行业就专门学习哪一行的业务。地方上没有房子，可以利用军队的营房，教员请地方出。这些干部往哪里安置，可以同国务院有关各部门商量。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纳的行业。比如，与军队干部的特长比较接近的政法工作，就需要大批干部。现在，警察不够，警官更不够，法院院长、法官、律师、检察官、审判员都缺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按道理，军队的干部应该比较合格。这方面军队可输送一大批干部。又比如，我们现在缺乏教员，可以安排一批军队转业干部去教书。当然，转业干部中能当大学教员的，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但是，能当中学、小学教员的还有的是。要说服这些同志去当教员。大家提到，大专学校设军体教员，这方面名额有限。全国大专学校只有几百所，每所学校假定平均用十个人，顶多能容纳几千人、万把人。但对中小学教员的需要是大量的。如果我们培训一批合格的教员，地方上可以容纳。还有，各行各业缺乏管理人员，只要经过训练，条件相宜，也可以安排一批。军队干部指挥部队，也是管理，总有管理知识嘛。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各行各业都愿意接纳军队的人呢？因为军队人员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比较高，还有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军队转业干

部中会管企业的人不多，但是总有管理军队的经验嘛！问题就是需要培训，转到哪一行就学哪一行。训练时间，有的半年，有的一年，有的一年半。经过训练，再转到地方，地方就比较容易安置。过去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无非去当政治部主任，搞政治工作或一般工作。现在这些人不缺，还有多余的。所以，要根据地方需要，按专业办训练班、速成学校等培训干部，解决“消肿”后的干部安排问题。

邓小平在此所谈军队的“消肿”问题十分具有说服力。邓小平层层道来，逻辑严密，从为何要“消肿”到如何“消肿”以及从军队“消肿”下来的干部如何安排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思考和准备。由此可见，邓小平语言的说服力以及行动的说服力都一一俱在了。

6. 军委主席与总长对话录

中国有句俗语：“仗可以千日不打，兵不可一日不练”。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知道，在和平时期，虽然没有什么仗可打，但军队的训练是不可以放松的。邓小平深深懂得这一点，就任军委主席后，他所决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 1981 年秋季华北军事大演习。

军官们都想把演习搞大一点，以便激扬军威，然而，搞演习是要花钱的，演习搞得越大，所花的钱就越多。当时我国正在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国家花钱的地方很多，军费开支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总参谋部和北京军区的筹划者们预定了三个方案：集团军规模的，方面军规模的，师规模的，请邓小平定夺。

预选方案送上去四天后，邓小平就把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召了去。杨得志首先汇报说：“演习拟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万人的方案；第二个方案，压缩到×万人左右；第三个方案，只搞图上作业。这三个方案考虑的根据，主要是调整时期要动用这样多的部队，动用这样多的钱，比较困难。在来之前，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有的同志说，搞第一方案演习花钱太多；政治上对苏联有没有影响？所得的效果又如何？还有的同志说，只动用××军加上一点训练保障，部队不做大的调动，可以节约一些。办公会议其他同志也认为规模小一点好，节约一点好。今天上午我又同秦基伟同志电话商量过，他还认为按第一方案好。我们考虑第一方案主要是花钱多些。”

邓小平说：

“我曾经听到过他讲过演习的设想，没有讲要花多少钱。”

杨得志两手交握，身体前倾，说：

“到底怎么确定好，请邓主席指示。”

张震对第一方案作了一些补充说明。他表述得简洁清晰。杨得志均已说清，不再补充，两人静静的望着军委主席，请他定夺。

邓小平一步到位：

“由于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应，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苏联也搞嘛！苏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

杨得志、张震很专注地听着，并不碰茶杯。77 岁高龄的邓小平说话缓慢，但很有力度，左手夹着烟，右手时而有个强调动作。思路惊人的敏锐，一句话一层意思，环环相扣。说完国外，话题回到国内。

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

“还有一个”，邓小平竖起一根指头，“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我们同越南打了一仗，还不是合成军。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吗？”

杨得志说：“对立案企图没有不同意，只是感觉规模大，花钱多。”说这话的时候，杨得志还在思索，邓小平讲的演习问题，着眼点显然是从政治

战略上考虑，给部队打打气，有鼓励作用，无疑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毛泽东讲话喜欢旁征博引，从侧面点拨。邓小平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但共同特点都是深入浅出，大话小说，看似不经意地即席发挥，深意却潜在里面。前面所说，表面也没离开方案，但实际上已超出方案和军事范畴，是在从政治上为演习规走指导思想。

果然，话锋又翻出一层。

“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象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现在人民不知道军队在干什么，经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给人民看，这样更加强了军民关系，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

杨得志默记——阅兵，观瞻，军民关系。

张震说：“去年××军搞了一次阅兵，空降兵走得最好，大家反映很好。”

邓小平说：“那次演习听说搞得不错，那次演习规模不大。”

张震说：“那次演习是一个师，也用了空军。演习的钱花了××万元，动用储备物资××万元，主要是油、弹药要钱。”

邓小平说：“就是花油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打的炮弹也多一些。”

邓小平捏着烟头又吸燃一支烟，扬了一下手掌：“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儿，总参具体抓。”

张震说：“杨总长是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的请秦基伟同志搞。”

邓小平说：“看看部队这次搞得怎么样，这样的规模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看这次的组织能力怎么样。”

张震说：“北京军区集训干部已搞过四次图上作业，已经有一定基础。”

邓小平说：“演习时各军区首长、各军兵种首长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总参要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儿，要把部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象个军队的样子，用炮弹可以，就是油多花了一些，现在主要是生产不出来。”

张震请示：“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要动用储备物资。”

邓小平最后说：“好吧！就这样。”

这次演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演习搞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在国际上都是比较罕见的。邓小平对这次演习十分满意。演习结束后，他高兴地与官员们痛饮了数杯美酒。这时，他的女儿担心他的身体上来劝阻，邓小平十分风趣地说：“我能喝，她尽给我捣乱，她不捣乱，我能喝十杯。”一席话说得大家都欢笑起来了。

7. 邓小平奇语震世界：

减少一百万，并没有削弱战斗力裁军问题历来是国际社会都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过多军队的存在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显然是一个威胁。早在二次大战以后，联合国就将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1945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更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然而，虽然人人都在喊裁军，喊了几十年，真正的裁军并没有实现，相反，世界军事力量却是增无减。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裁减军队，反对军备竞赛，早在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在近10年的时间中，我军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1984年国庆阅兵式刚过，11月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座谈会上，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时邓小平说：“从哪里讲起呢？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邓小平出语不凡，这些话讲得真是语重心长，发人深思。随后他提出要裁军100万！他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重申了裁军的话题，邓小平说：

在这么一个重要会议上，我想先就裁减军队这件事情，讲几句话。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过去我们讲过，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11）。

这段话的口才是很值得我们细细欣赏的，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用朴素平凡的语言表达了一个令全世界震动的决心——裁军100万。没有耸人听闻的词汇，也没有夸张激越的腔调，但这段话却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和气势，它所产生的冲击力是空前强大的。邓小平说：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这真是出语奇诡，让人无法预料。没有对国际局势的深入分析，没有出色的军事头脑是讲不出这样一番话的。这之后，邓小平又谈到了两个转变的问题。他思路敏捷，条理清晰，对世界大势的分析透彻深入，准确精辟，所言之事不能不令人信服。邓小平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

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像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总之，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

8. 绘声绘色他讲战斗故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逐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了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邓小平再见到当年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时不禁感慨万端。他一开口就充满感情地说：“这些老人啊！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儿见面了，今天随便聊聊吧。”说罢，他就以亲切随和的态度，像拉家常似他讲开了，他说：

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接着对马法五、高树勋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那时宋任穷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拚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

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走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从东向西数，一纵杨得志、苏振华，在冀鲁豫；二纵陈再道、宋任穷，在冀南；三纵陈锡联、彭涛，在太行；四纵陈赓、谢富治，在太岳。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

邓小平在这里首先回忆了解放战争时期，二野军团所打的两个战役——一个是上党战役，一个是平汉战役。他肯定了二野军团赫赫的战功，对战争故事的叙述也是极为精采的。他既生动地描述了战争的经过又总结了战争成败的经验。随后，他谈起了二野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战——大别山之战。那时，二野军团挑了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挑子，往南直下一千里，挺进大别山。邓小平的叙述是很有吸引力的，他讲到了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又以深刻的见地谈起了我军致胜的谋略，他说：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赢。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走。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肉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中国真正的南北界线是淮河，淮河以南就叫南方，不是长江以南才叫南方。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

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因为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干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有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国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主体四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三个旅，就这样迎接淮海战役。当然中间还打了一些小仗，凡是有机会取得胜利的，没有丧失过机会，该干的都干了。后来，转出大别山，以后到了豫西，成立扩大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这之后，邓小平讲到了淮海战役，他朴实无华的话语中明显地透出了一种英雄的自豪，他说：

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

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一句十分自豪的话，也是一句令人激动的话。它把当年的情景栩栩如生的再现了出来，令听活的人无不心潮难平。随后，邓小平又以一个军事家的深谋远虑分析了二野之所以能成为了不起的部队的原因。他说：

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下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队作战一开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1950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时二野还增加了一个十八兵团，十八兵团原先也是晋冀鲁豫的部队。

这就是二野的历史。二野担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概括全体，情况都是这个样子。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

二野的光荣故事是说也说不完的，在这里邓小平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们讲到了一些。他的语言是朴实的，然而朴实之中又有引人入胜的力量，他的语气是平缓的，但平缓之中又流露出无比的亲切和对人世苍桑的感慨。他娓娓对我们述说，既有生动的故事，又有精采的谋略，既有对往事的依恋，又有奋发向上的英雄主义气概，真是万种风采融为一体，给听者营造了一个五彩缤纷，魅力无穷的世界。

六、文教口才

1. 在美丽的晴空下，开门见山、纵论文化

1941年5月的一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邓小平这天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作了一篇有关文化工作的报告《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的方向》。

邓小平开门见山，直接切入问题，显示出他口才的一个特点，即决不拖泥带水，兜不必要的圈子。

他精神抖擞地说道：“我讲三个问题。一、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

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

今天的中国，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在第一个问题中，我们可看到邓小平的文化观或文艺观与毛泽东是不谋而合的。毛泽东曾说过超阶级的文艺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此，任何文艺都应有一定的阶级性。这的确是一个普遍的真理。邓小平在此也一针见血地点出：“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这句话不仅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性，同时也具有一种令人折服的口才的闪光。邓小平为我们道出了文化的本质。

为什么说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呢？邓小平又细细为我们道来，使得这个立论更具有了说服力。

他说：（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剑·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他们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好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好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以实施其海淫海盗、毒化奴化政策。他们还制造谣言流言，散布失败情绪，推行怀柔政策，破坏我抗战法令，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

（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在政治上具有抗日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反共顽固派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妥协，对内搞封建主义。他们提倡旧思想、旧制度、旧道德，主张尊孔·、复古，保存“国粹”，读经救国。压制新文化运动，摧残新文化事业，封闭进步书店，禁售进步书籍报刊，压制抗日言论，镇压与取缔人民的反帝运动。宣传反共，排除异己，反对进步，鼓倒退。组织封建迷信团体，

破坏抗日军队、抗日政府和抗日根据地。颂扬独裁政治，宣传“安分守纪”、“严守国法”，使人民任其宰割。

这种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起了帮助的作用，对民族前途危害至大，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三）抗战民主派，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洛浦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

“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

“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

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

的确以理服人。三个阶级三种文化态度，邓小平在此为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充分显示了他滴水不漏的口才。

谈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后，邓小平才转谈第二个问题，即“本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

他在点出了“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这一至理名言之后，又一口气谈了七点文化工作的具体方针和任务。在第四点中，邓小平号召全师应“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宣传。”在第七点中，他谈得更为具体，从中完全显示出他是一个文化方面的行家里手。他说：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邓小平在这里连“报告文学、摄影、绘画”都提到了。

接下来，邓小平话锋一转，又论述了文化艺术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与缺点。他尤其批评了“某些作品缺乏丰满的现实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性，缺乏强烈的政治性，有的甚至与政治原则还有抵触之处，起了不好的作用。宣传形式不够大众化，往往不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也不善于多方面地多样地表现政治内容，有时在表现急遽多变的现实上显得无能。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比较复杂的高级形式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向比较简单的普及的形式发展。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但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

邓小平的这节论述表现出极好的文学修养，口才当然也是十分完美的。

接着邓小平继续推进，发现了缺点就得克服缺点，他又谈了克服不足与缺点的四个意见，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四个诀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文艺

工作者提高和加强文艺方面的修养和政治学习。这两点可谓切中了要害。因为照后来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二者不能偏废。

最后，邓小平才全盘抵达他口才的终点，即第三个大问题，“关于宣传队工作”。他在此强调了“学习”、“政治”以及“不断增进新的知识”的重要性。

这样，优秀的思想以及稳健深刻的口才就一拍即合。

2. 邓小平言简意赅，教育妇女

1930年春，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培训骨干力量，军前委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在武篆旧州屯，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学员共有一百多人左右，其中女学员十几个人。邓小平亲自给这一批学员上课，每隔三天来讲一次。主要讲的是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建设问题，有时也联系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问题。

邓小平讲课十分生动，口才极好，采用启发式教育。一次，他向女学员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妇女受苦受难，走路讲话都抬不起头来。现在为什么能和男人一起参加学习？”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巧妙。据当时参加学习的黄美伦回忆，她一听邓小平提的这个问题，立即鼓起了勇气，大胆地站起来发言。她谈到了自己在参加革命后，才逐步认识到只有打倒封建统治阶级，妇女才会有真正出头的日子这一想法。

邓小平听了她的回答后，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他接着又问了一句：“你再讲一讲，革命给妇女带来什么好处？”

“读书明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黄美伦一口气搬出了十条好处。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笑了。这时，课堂气氛也活跃了起来。最后，邓小平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的话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可以说是句句说在了要害处。他联系当地妇女的实际情况，从妇女过去受到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一直说到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同时，他还赞扬的武篆妇女们的作用：组织妇女赤卫队、配合红军上山剿匪、护理伤病员、做军鞋、做米袋等等。接着，他还指出了今后妇女工作的方向。

在学习期间，每个学员都领到了两本油印教材：一本是《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另一本是《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这两本书都是邓小平编写的。据黄美伦回忆，邓小平写好此书后，还叮嘱刻钢板的同志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你们刻写时，字体要写得端正，笔划要写得清楚，使大家容易看懂！

邓小平在这个时期从左江到右江，沿途跋山涉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会布置工作，找群众谈心，得心应手地施展他那一流的教育宣传口才，以十分通俗生动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

从这节文字中，我们足以领略到邓小平口才早期的风采。他说话实在，没有废话、空话，更不尚空谈。他谈话没有长篇大论，而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并总是启发对方主动去开动脑筋想问题。

因此，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民如子的教育家。

还有一次，依然在右江，邓小平来到奉议县花茶屯，准备找当地干部开个会。会前，庙堂门口围着一伙人，在说说笑笑观看几个赤卫队员煮饭。邓小平也走过去与队员们亲切地交谈起来。当时，赤卫队员们不但筹粮不容易，就连厨具也被敌人抢劫一空。当中一位手拿铁锹作锅铲用的队员，正在比比划划跟大家开玩笑：说过去的皇帝权力很大，他使的家伙也比一般人用的大。邓小平听了，也笑哈哈地说道：皇帝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们也拿起大铲，把那些皇子皇孙铲除干净！他这生动的比喻，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接着，邓小平话锋一转，又说：“怎么样，你们敢不敢？”赤卫队员们

坚强地回答：“怕什么，怕就不来当赤卫队员了！”

邓小平听了这回答，满意地笑了。由此可见，邓小平十分善于抓住一切机会，用他那幽默而富于感染力的语言，去宣传党的主张，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

邓小平在右江期间，还主办过“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据黄大健回忆，那时，邓小平约26岁，穿着十分朴素，常穿半新旧的白色汗衫和半新旧的灰色裤，光着头，赤着脚，平易近人。他讲课精神充沛，态度和蔼，声音清晰、洪亮、有力。

3. 邓小平妙语教育小荣香

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很关心干部队伍的成長，他常说：“革命干部是党培养起来的，是党的财富，我们要大力培养和重视革命干部，革命才能成功。”

年底，瑞金县委在县城同善社举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当时在南郊乡工作的杨荣香年纪很小，才十五六岁。

邓小平待他像自己的小弟弟一样，很关心他的学习和进步。

一天，邓小平对小荣香说：“荣香，你准备一下参加干部培训班。”

“我不去！邓书记。”小荣香沉思片刻后回答说。

“为啥子不去？”小荣香低下了头不吭声。

原来他心里有顾虑。他想，前几个月肃反杀“社会民主党”，杀了那么多人，那些人都是党团员、干部，连老县委书记邓希平等人都被杀。

邓小平知道小荣香的心事后，和蔼地对他说：“荣香啊，肃反扩大化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已经纠正了？难道老书记被杀害了我们就革命了？怕啥子嘛，不能一朝被蛇咬就十年怕草绳。要跟党走，要坚定革命的信念才对头。”

通过邓小平的引导教育后，小荣香解除了思想顾虑。他来到邓小平办公室，双手揉搓着衣角，红着脸对邓小平说：“邓书记，我想通了，只有跟党走革命，我们穷人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让我去参加培训班吧。”

“这才像个干革命的样子。”邓小平微笑地在他鼻子上刮了一下说。

小荣香参加干部培训班后，学习很认真，进步很快，得到老师和同志们的赞扬。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当上了瑞金少先队的总队长。

邓小平说话的确是能说到点子上，而不是长篇大论漫无边际，从他教育一个少年小荣香这件事就可看出他说话的艺术，尤其是在简洁明快的几句话中，说出了，“不能一朝被蛇咬就十年怕草绳。”这样生动形象的话，更是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4. 拿起你的笔杆子

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带着愉快的心情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生动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中心是谈领导艺术的，而这个艺术的中心是讲如何学会拿笔杆子。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不仅口才好，而且笔头也快。他的行文与他的口才一样十分生动有力，并且句句实在，具有深刻的哲思，同时又能具体地对我们的工作与学习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正因如此，邓小平在全国胜利后，在此告诫党内干部一定要重视笔杆子，即一定要会写。邓小平说：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笔杆子太重，不会写，怎么办？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领导同志不愿意写文章，新闻工作同志要主动去做工作，他不愿写，总有一个理由，“不会写，写不了”，或者“没有功夫”，那就主动找他，“你讲我写”，或者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但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写，新闻工作同志主动帮助，有计划地组织稿件，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

邓小平对于宣传工作的确是精通的，他深知报纸和写文章的重要性。

接下来他专谈了报纸，甚至还细致地讲了如何写文章。

他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过去表扬了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什么叫生动活泼？不在文字长短，而是要写出生动的过程，而且有结果。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

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

任何一个任务不是一家报纸所能完成的。各家报纸接触面不同，要各方面努力，才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

在此，我们通过邓小平谈办报，欣赏到了他那令人折服的口才艺术，而且还深懂了笔杆子的重要性。

5. “《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发言。

邓小平首先非常谦虚地说：

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虽然这次会议因为时间匆促没有邀请社会科学家。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大家可能没有全讲出来，或者没有时间完全讲清楚，好在以后还有机会讲。

接着，邓小平以他一贯的干脆利落的口才一口气讲了六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也就是说对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科技和教育战线的估计问题。总体来说，还是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调动积极性问题”。邓小平在此大展口才，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知识分子放下包袱，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

邓小平在谈到“劳动”及“尊重劳动”时，尤其谈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说：

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不是讲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吗？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有位科学家反映，现在在农业科学院种庄稼不算劳动，要到农村种庄稼才算劳动。这真是怪事。好多农业院校自己培育品种，自己种田，怎么不是劳动？科学实验也是劳动。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自动化的生产，就是整天站在那里看仪表。这也是劳动。这种劳动同样是费力的，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要把这类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

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你们讲科研机构要出成果、出人才，教育战线也应该这样。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才，好的教师就是人才。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邓小平这节谈话十分精采，充分运用了口才技巧，以“臭老九”来指知识分子，是典型的反话正说，既生动又幽默，起到了对知识分子的赞美作用。

然后，邓小平还谈了“关于体制、机构问题”、“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关于后勤工作问题”、“关于学风问题”。

最后，邓小平为了更多地印刷学术刊物，甚至要求不必印的文件就不要印，一定要保证学术刊物的出版，因为纸张紧张。由此可见，邓小平对知识、科学的重视达到了何种程度。

6. “我的抓法是抓头头，抓方针”

1977年9月16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谈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情绪热烈而饱满，语言干云冲天。

这一次，邓小平公开提出了拨乱反正这一重大主题，从教育界开刀。由此可见他的英明以及救国救民的苦心。因为教育历来是

任何一个国家都应高度重视的，教育上去了，国民素质才能上去，国家的建设才能搞上去。邓小平当然深懂此道理。

邓小平说：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重点大学搞多少，谁管？体制怎么定？我看，重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所学校，搞点示范。学校每周学习时间多少、政治活动时间不能超过多少等等，这些都要具体化，教育部要干预。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师范大学要办好。省、市管的师范院校，教育部也要经常派人去检查。不办好师范教育，教师就没有来源。

大学学制本科一般定为四年，这个问题认识基本一致了。医科不同，可以长一些。还有个别专业也可以长些。所谓四年，基础课恐怕要两三年。基础打得不好，搞科研是有困难的。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

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

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最后一句话最能代表邓小平的性格，同时也最能代表邓小平的语言特色或口才艺术。“办事要快，不要拖。”读起来有一种雷厉风行的感觉，令人振奋，催人抓紧。语言附着思想，附着一种节奏在此起到了一种很好的作用。

7. 呼之欲出的文艺春天

“四人帮”被打倒后，人民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

1979年12月30日，邓小平满怀激情地作了一篇重要讲话《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邓小平肯定了文艺工作者所从事的事业，认为这是一个崇高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文艺发展有非常广阔的天地。

接着邓小平满怀赤子之心说道：

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没有把他们挡住。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邓小平熟悉各种艺术风格，他在这里为艺术家们打开了一片广阔的晴空，任其邀翔。而不是“四人帮”时代为艺术家们设置各种精神枷锁。

总而言之，邓小平的这篇优美的演说，不仅表现出他的文艺口才，而且也让我们感受到他是一位真正的文艺内行。

他以专家般的语言说道：

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最后，邓小平以一种欢乐颂般的心情说道：“这次大会，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新长征中的第一次盛会。”

8. “思想战线上的战士， 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一篇重要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邓小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整党”，第二个问题是“精神污染”。

邓小平纵横捭阖，侃侃道来：

第二个问题：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思想战线范围很广，我现在主要说理论和文艺战线。几年来这两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历史的科学总结，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加强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围绕这些，理论界做了许多研究、论证和宣传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理论和学术的各个领域，许多同志辛勤劳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成绩是主要的，要充分肯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今天想着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和历史遗留的种种因素，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反映，包括一部分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大多数人正是在不同程度上这样做的。但是，一些人却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

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

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

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对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在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

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但是，上面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

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

这类作品虽然也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有的党员也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这是产生上述各种消极现象的重要原因。

“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有些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也被卷到里边去了。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走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既要搞改革开放，又要杜绝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入。邓小平因此为我们道出了精神污染物的可恶与可害以及必须予以清除干净的必要。

后来，邓小平从此发展出一系列的“两手抓”方针。这些“两手抓”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同时也是真正一流的口才。

如：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工作，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包括纠正不正之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一系列抓法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就是既要抓“矛”又要抓“盾”。“两手抓”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的确不失为好口才。

9. “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

邓小平对“抓”字情有独钟，运用得也非常好，使其在他的口才中显得极为夺目，而且这个“抓”字也表现出他坚定的性格和治国理念，如前面所说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等。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整个讲话都透露出一个“抓”字的果敢与力量。其中警句与妙语横生，我们在此不仅领会了他的思想，也欣赏了他的口才。

邓小平一上来就说：

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经济犯罪的案件，在国外严重丧失国格人格的事件，还有搞特务的案件，都要抓紧处理。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具体如何抓呢？邓小平继续坚定地说：

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司法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陈云同志：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现在一般只是杀那些犯杀人罪的人，其他的严重犯罪活动呢？广东卖淫罪犯那么猖獗，为什么不严惩几个最恶劣的？老鸨，抓了几次不改，一律依法从重判处。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死刑？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

接下来，邓小平开始对书记处谈“抓”的重要性以及怎样“抓”的问题，语言干脆利落，有一股雷厉风行的气势。邓小平说：

书记处抓整顿风气抓得好，建议狠抓两年，抓出成效。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漏洞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在整顿风气中确实有些人要开除党籍，要清理一下。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十年的努力不行。十年育人嘛！

“文化大革命”十年，青年一代中毒相当深，有些大学生闹事就是同这种遗毒有关。前两年抓整顿风气这件事，实际上在许多方面犹豫不决，明明白白的案子，这里调查那里调查，这里批那里批，批了调查，调查了批，好几年处理不了。有些案子当断即断，抓住事件的主要问题，清查了就处理。也有个雷厉风行的问题啊！

从这次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开始，要狠狠地抓。大会开了还不到十天嘛，各方面反应都很好。会上几位同志的讲话也算是中央一号文件，一九八六年一号文件嘛。

还是我们过去的想法，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为什么要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

今年开始，真正抓两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赞成书记处这么抓。

七、科学口才

1. “一个石头打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

邓小平一生尊重科学知识，这一美德是人人皆知的。然而有一点恐怕许多人不知道，那就是邓小平从童年时代就很有科学的头脑了。

邓小平童年时非常活泼，肯动脑筋而且还很有胆识。他小时候有一次同几个小孩去石坝玩耍。石坝离他的家只有半里之遥。说起这个石坝还颇有一番来历的。石坝的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石碑高3米，宽1米多，镶立在两个巨大的石乌龟背上。当地百姓对这两位先人是十分尊崇的，流传着一些十分敬畏二人的神话，甚至说这两块神道碑碰不得，也攀不得。

这天，邓小平和几个乡间的孩子正好在这石坝玩耍。他看着这硕大的石乌龟对小伙伴们说：“我们爬到乌龟背上去耍好不好？”

小伙伴们一听全都吓坏了，赶紧劝道：“不行，不行，爬石乌龟会肚子痛的！而且听大人说，得罪了神碑家里要招灾的！”

邓小平壮起胆子沉着地说：“一个石头打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就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去试一试！”说完他就走向神道碑，爬到石乌龟伸出的脑袋上，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喊道：“快来哟！好耍！好耍！”

其他娃儿见状都惊呼起来，“贤娃，快下来，你要惹祸的！你惹了祸我们也跑不脱！”

邓小平还是悠闲自在地玩着，扭转身来又向龟背上爬了过去。边爬边说：“若祸就若祸，看它怎么奈何我！”最后，他爬到神道碑上坐定下来。

这时小伙伴们在惊怕之后也露出了羡慕的神情。

从此，邓小平经常爬到石龟及神道碑上去玩耍，其他小孩也慢慢地胆子大了起来，跟着邓小平一块爬到石龟背上去玩。

渐渐地，邓小平随着年龄稍长，知识也扩充了，他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也愈发爱动脑筋，愈发讲究科学了。

就在邓小平读高等小学堂时，班上曾发生过一桩震动全校的奇事。

事情是这样的，和邓小平要好的同班同学李再标一天突然表示要割肝救母，李再标出身广安一富商家庭，从小深受母亲宠爱，对母亲十分孝顺。不久前他母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李再标见此情形内心十分焦急。由于他读了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毒害比较深，于是一些孝子离奇古怪的行孝故事启发了他。他认为只要将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母亲吃，母亲的病就会被治好的。为了痛表自己的孝义以及挽救母亲沉重的病势，他决心割肝救母，幸好被及时发现，受到阻止，刀子只有肚子上划了一个口子。

邓小平得知此事后，立即赶去探望。当他问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就严肃而认真地施展他的科学口才，说道：“你是一个有点科学知识的学生，肝子是药物吗？能治好你母亲的病？你割了肝子后还能活命吗？既然你母亲很爱你，她又重病在身，如果你割肝而死，你的母亲肯定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命归西天，结果是我想治母亲的病而适得其反。”

邓小平这番话讲得既直率又合情合理，李再标一听才猛醒过来，不觉面带着愧之色。邓小平见状又耐心地说道：“你也是读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也不能做这种瓜事了。”接着，邓小平话锋一转，又给李再标出了一个好主意：“你还是先请几天假，回家去请医生给母亲治病，同时好好

照顾她老人家，这才是你作儿子的真正孝心。”

邓小平相信科学、能言善辩，用他早已超出同龄孩子的口才开导李再标这件事立即受到了全校老师的广泛称赞，并且一直被县立高等小学堂传为佳话。

年龄在一天天的增长，眼界也在一天天的扩大。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风暴随之刮到了广安。年仅15岁的邓小平也在广安投身于这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同时，邓小平在五四运动中，也受到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洗礼，思想上更是上了一个大台阶，他感到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只有每个青年都掌握了一种科学本领，立志改变国家现状，中国才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侮的强国。

2. “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了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的汇报后说了一席非常富有启示性的话。他开宗明义说道：“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

接着，邓小平继续说：

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大学毕业二十多岁，经过十年三十多岁，应该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中央表扬了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

有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京大学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

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广大的科研人员实在是想搞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现在这个状况是能够改变过来的。

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不把领导班子搞好，谁来执行政策？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岁的人来搞。好的可以管党务工作，管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很重要，它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保护和管理好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不是忠心耿耿的人，不懂科学知识的人，是搞不起来的。这也是科研工作中的政治工作。党的、科研的、后勤的工作，三个部分，没有后勤，科研搞不起来。不能叫科研人员还去搞后勤，整天东跑西跑。要让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

我们还要把那些比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建立科技人员档案，帮助他们创造条件，不管他们资格老不老。1957年我去苏联，尤金说，苏联的原子弹，是三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这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啊？总之，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

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

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

。邓小平在这节谈话里对科技人员给予了应有的尊重，而且谈得句句入理，让人心服口服。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是一个敢字当头的人，他的口才自然也有一股朝气，当时邓小平刚复出，但他却大刀阔斧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他不仅在这次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给予了赞扬，在同年8月3日，他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时也说过：“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

3.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说出了两句非常有名的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两句话在科技界和教育界引起了热烈的欢迎。

在这次著名的谈话中，邓小平抓注了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发展的本质。

邓小平说：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很多时间用于料理生活，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他们做好研究工作，出了成果，就对政治有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一站好几小时，就既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也要一起抓，进行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要办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同时使我们的部队干部年轻化。六十岁的人当军长是不行的。

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

邓小平从科技谈到教育，谈到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然后，推而广之，他还谈到全党、全军以及各行各业都要大抓科技的重要性。邓小平在此动手解决了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气魄。

4. 邓小平为我们道出了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又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他在开幕式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还满怀激情地提出了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

讲话一开场，邓小平就以他那充满诗意的口才为我们描绘并指出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接下来，邓小平以事实胜于雄辩的口才批判了“四人帮”对科学技术所进行的疯狂的破坏，然后话锋一转开始纵论四个现代化中的至关重要的一项，即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邓小平大展科学口才，当然他本人对现代科技的进程亦是十分熟悉的，因此讲起来的确相当吸引人。他说道：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从这番精彩的谈吐中，我们完全可以领略到邓小平对科技，尤其是现代科技的熟悉程度，的确堪称了如指掌。

接下来，邓小平从哲学和经济学的高度，展开了纵横对比。他说：

大家知道，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

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

邓小平的演说若长江大河，有一股气势。在气势之后，他也谈了十分具体的任务，也就是说，“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而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又是科学未来的根本保证，邓小平也一一为我们点明。

最后，邓小平还讲了科技部门的各个研究所中，应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邓小平说话永远给人一种踏实可信的感觉，而且从口才技巧上来说也是很全面的。他每谈一个问题，都能谈到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而且谈得深、谈得细，真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5. 邓小平对金日成说： 一家搞一个池子能煮饭照明

邓小平一直心系科学，而且尤其关心科学技术的具体运用，即如何推广到人民大众的生产与生活中去，为人民广谋福利。

小小的沼气就引起过邓小平浓厚的兴趣。

1983年9月21日上午，金日成主席由邓小平、谭启龙同志陪同，冒着毛毛细雨来到成都市郊的双流县白家公社顾风大队第二生产队。邓小平同志对金日成同志说：“今天请你看看农村的沼气。”

这个生产队掩映在一片竹林丛中，迎候在村口的数百名男女老少，挥动着中朝两国国旗和花束，高呼：“欢迎！欢迎！欢迎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和邓小平同志等首先来到队长曹德昌的家，这是一栋用红砖、水泥所砌造的2层小楼，共8间房，住房面积有200多平方米。全家7口人高兴地吧贵宾引进宽敞的厨房。金主席站在镶着瓷砖的锅台前，观看了使用沼气的炉灶、炉具，还弯下腰仔细查看沼气管子是如何通进来的。在沼气灯点亮以后，金主席说：“这个东西很好！”邓小平同志接着说：“这东西很简单，可解决了农村的大问题。光这个省，每年就可以节省煤炭6百万吨。”

听到这里，金日成同志转身把随行的平壤市党委书记徐允锡叫到面前，要他仔细看看，并说：“这个东西的确很简单。”

顾风大队第二生产队有27户社员，以往每年每户平均要烧煤1吨；现在全队建有沼气池52口，家家户户做饭都用上沼气。

从曹德昌家出来，邓小平同志说：“再看看沼气池。”

他们来到社员周道根家楼后边的一口沼气池旁。当打开池盖时，谭启龙同志告诉金主席说：“这里边是人粪、猪粪和草，发酵以后就可以产生沼气。”

邓小平同志介绍说：“沼气能煮饭，还能发电。一家搞一个池子能煮饭照明，几家联起来就能发电。搞沼气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

金日成同志说：“这个很好。我们朝鲜有条件，有人粪、牛粪、还有草；我们也可以搞。”他还询问了沼气池的造价。

在拖拉机手贾崇林家楼下的仓室里，中朝两国领导同志看着新收的大堆稻谷，脸上都流露出喜悦的神情。这个生产队去年平均亩产粮食1,274斤，今年的收成又胜过去年。

在离开这个位于成都市南郊的生产队时，金主席握着双流县委书记王知深的手，兴致很高地说：“看到了你们很好的宝贝。谢谢你们的经验。我们农村要好好推广。”王知深感谢金主席对社员们的鼓励。他说，我们也要学习朝鲜人民的好经验。

6. “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的一个著名思想，同时也是他闻名遐迩的科学口才。他多次提到这句话。

1988年9月5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就说过：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了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再次以高瞻远瞩的目光说道：

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的工资从建国时候开始就是这么多，但是现在物价涨了，我的生活水平降了三分之二。”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我们还没有。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者在现有的一些科研机构 and 大学里增设一些专业，把这些人放在里面，攻一个方面，总会有些人做出重大贡献。否则，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

7. “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早在 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就曾系统地阐述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

1986 年 10 月 18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夫妇时，又一次提出了。“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这一著名论断。

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对李政道一行说：

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你们成立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特别是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刚起步，也许本世纪末可以看到比较显著的进步，真正的进步要到下个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中国的特点是又大又落后。办起事情来不容易。对于你们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当然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从现在的状况看，是有希望的。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现在看来搞对了，决心下对了，起码争取了几年时间。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邓小平将科学提升到如此高的高度来加以认识，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深懂科学的人。

8. “我先讲个故事”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满怀兴致地视察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他一边视察，一边发表了有关科学问题热情洋溢的讲话。

邓小平说：

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李政道和其他国际朋友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

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邓小平的讲话实在而深具说服力，同时也发人深醒，使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9. 望“财神爷”放开手脚，大干快上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了一篇重要讲话《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开宗明义，直接切入主题：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祝贺你们会议的成功，是表示对科学技术、对知识的尊重。

七年前，也是三只份，开过一次科学大会，我讲过一篇话。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两句话。一句叫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叫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所以要讲这两条，是因为有争论。七年过去了，争论已经解决了。结论是谁做的？是实践做的，群众做的。

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但是，他们的意思，同我在科学大会上讲的话是一样的。

我也很高兴，科技界的同志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国家的经济搞得不错，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人民是满意的，全世界是公认的。这里面，有你们的一份功劳。中央要求科技界面向经济建设。你们是出了大力的。同志们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我们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走到工厂，走到地方，到处都受欢迎，到处都请你们谈战略，谈远景，谈规划。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科技专家在我们国家里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已经同过去大大不同了。你们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有成绩，就会使全国人民越加懂得知识的可贵，推动大家都来尊重知识，学习知识，掌握知识。人们正在通过你们的工作，来评价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评价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

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走。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现在，中央还要作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你们这次会议为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准备。这个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这个文件的方向，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今天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两点，请各单位讨论一下。

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

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这是大局。我们在国际上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在国内要排除一切干扰。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工作，只是为大家创造条件。有了干扰，就排除它一下。发现有什么东西束缚了大家，帮助大家想点办法，解放出来，工作还是要靠大家去做。希望大家放开手脚，把经济搞上去，把生产力搞上去。

朴素的语言为我们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也是邓小平后来说过的一句旷世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如何发展呢？

邓小平抓住了症结，点出了要害，那就是改革科技体制，让科学技术人员这些“财神爷”放开手脚，大搞经济、大搞生产力。

10. “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

1992年年初，邓小平乘着快艇穿过碧波荡漾的伶仃洋去珠海视察。在珠海期间，他参观了一些高科技的厂家和公司。邓小平历来关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在参观过程中，他看到我国科技工作取得的成就十分兴奋，滔滔不绝的话语也不知不觉涌了出来。在珠海生化制药厂参观时，该厂厂长向邓小平介绍了他们生产的一流产品“凝血酶”，这一药品已打入了国际市场，创利颇丰。邓小平听完介绍赞赏地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

邓小平的这番话是讲得十分有份量的。我们人人都知道，人穷了要受人欺负，国弱了要受人欺负，产品不好也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小平所讲的这些话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创名牌，出精品的迫切。同时，一种自强不息，不甘示弱的可贵精神也从这些话里透了出来。

接着，邓小平又对该厂的负责人说，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应有一席之地，你们这个厂的发展就是一席之地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每一年都有新东西，每一天都有新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有希望，很有希望。这十年进步很快，但今后会比这十年更快。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业，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个办法。

这是一番朝气蓬勃的谈话，也是一番雄心勃勃，充满活力的谈话。“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有希望，很有希望。”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又催人奋发的肺腑之言呵！

1月25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同志来到珠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

小平同志一下车，看到公司门口站立着那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十分高兴地向大家招手，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年轻啊！”

他走进公司大厅，在一张长桌前坐了下来。公司总经理游景玉向小平同志详细介绍了公司的科研、生产和科技队伍等情况。当游景玉同志汇报到亚仿公司走的是一条科技、生产、效益相结合的道路时，小平同志问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游景玉同志回答：“我认为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听后，对大家说：“就是要靠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它是正确的。”大厅内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随后，小平同志又亲切地问游景玉：“你是留美学生吗？”游景玉同志说，我曾经去美国接受培训，负责引进仿真技术。我们这里有一批人在美国学习过。他们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决心把祖国的高科技事业发展起来。

小平同志沉思片刻，深情地说：你们带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样，都可以回来：回来我们妥善安排。起码国内相信他们。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接着，小平同志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公司的计算机房。只见不久将要交付使用的两组分别为330Mw和200Mw的模拟火车发电机组正在调试。这是具有九十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产品，它凝聚着亚洲仿真公司全体科技人员

一年来日夜奋战的辛勤劳动。

参观中，游景玉同志汇报说：“我们公司投产第一年，人均产值达 20 多万元。”小平同志马上接着道：更重要的是水平，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了一批产业的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游景玉同志告诉小平同志，他们公司 105 人中 80% 以上是博士、硕士和高中级科技人员。小平同志听后看着机房内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对科技人员感慨地说：你们现在的条件要比五十年代好多了。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项目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你们的要求也更多，更高了。

小平同志在计算机房内走着看着，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当他走到一台计算机旁时，停了下来，与一位正在操作的复旦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交谈起来。小平同志握着这位年轻人的手，高兴地说：要握一握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当然老科学家也是很重要的。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接着，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对国家要爱哟！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全国各行业要共同努力，来证明我们可以干得多事情。走出计算机房时，小平同志高兴地连声说道：“好东西，好东西啊！”接着又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调动人力，统一规划，集中人才，打歼灭战。”

离开亚仿公司后，小平同志在车上依然谈锋甚健。他说：真高兴啊，我真高兴看到这样年轻的队伍。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 100 个中学生，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在这个公司就差不多有 100 人，学历比那时高得多了，珠海这个地方就容纳了这么多高科技人才，从全国来说，就更多了。

梁广大同志接过话题说：“您一贯重视科技人才。根据您的思想，我们准备在今年 3 月召开推动科技进步大会，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轿车，住房，现金等重奖。”邓小平点点头说：今天我看到那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有希望啊！从中国出去的科学工作者，都很怀念祖国，这很好啊！要把他们吸引回来。不是讲改革开放吗？开放嘛，进出就要自由一点嘛。事实上，回来的，绝大多数都能学有所用；只要安排妥当，绝大多数留学生回来后是不会出去的。

八、人生·哲理口才

1.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在邓小平的口才中最富有哲理的恐怕就要数他那句名扬海内外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以下简称“猫论”）

据说这句话是邓小平的老朋友刘伯承在打仗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其道理即在打仗时不应拘于教条，应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地安排战略战术，一切视情况而定，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这句话由于言简意赅，生动形象，颇具说服力，因此深受一二九师和二野指战员的喜爱。

邓小平对刘帅常说的这句家乡话也倍感亲切，十分理解，非常赞同。但作为一名成熟的高级领导人，邓小平深知自己言论的重大社会影响，所以对于“猫论”的引用十分慎重。有关材料表明，60年代以前，在正式的公开场合，邓小平始终没有提过“猫论”。到了60年代前期，他也只在一些范围很小的会议上，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偶尔几次引用过“猫论”。其中较有影响的一次是1962年7月2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农业问题时的讲话，一次是同年7月7日在接见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大家都知道，60年代初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犯了刮“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错误的，把生产关系搞乱了，全国的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损失最重。这时，作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果敢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目的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所以不能在生产形式上简单划一。因此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两条标准，也是二个硬道理，即他后来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此句与“猫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一，“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第二，“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第一次公开地亮出了他有关“猫论”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次向正统思想提出挑战，肯定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深受农民欢迎并且可以大力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策略。邓小平的这一提法充分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 and 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从此，“猫论”不胫而走，在一定的范围内流传开来。

“猫论”这句朴实的话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而深刻的启示又一定要以生动形象的口才表达出来，因这样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理解。如果一个思想或一个哲理说得过于专业性、学术性，大多数人们就不太理解了。因此，可以这么说，一个人的口才是相当重要的，只有口才好，思想才能生辉，才能被人们喜闻乐见。而“猫论”是真正堪称一流口才的范本。它在最为形象的层面上为我们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猫捉老鼠是天经地义的事，而猫的颜色是根本没有挑剔的必要。从此，“猫论”以它简洁明快不可抗拒的哲学力量和逻辑力量为我们开启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门。同时也宣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至深道理。

邓小平后来说过：“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我们都采用。”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与李政道夫妇谈话时还说过：“他们许多人（指第三世界国家，编者注）想搞社会主义，我劝他们按照自己的情况搞，

叫什么都可以，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

邓小平在这里再次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他那闻名遐迩的“猫论”。

“猫论”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村生产形式的选择问题的，后来它的内涵更广大了，也更丰富了。它渐渐上升为一个哲理的问题，那就是一切都要讲实际，要看“硬道理”，要务实，切忌务虚。

随着时间的推移，“猫论”已愈发显示出它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超越了国界，还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有关人士的首肯与研究。《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对“猫论”还作过一番精辟的解释：“为了使中国在2000年达到技术合理化，准备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如果这样做要放弃毛的蓝蚂蚁式的公社而代之以个人耕作和个人收益的办法——好，那就这样做吧。（见《海外人士心目中的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猫论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它成为了邓小平人生哲理的一个重点，同时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好大的启发。我们在一边欣赏这句话的口才的同时，也欣赏到了邓小平的人生智慧。真正是一举两得，获了一个双美。

另外，再说一件有趣的有关“猫论”的逸事。

邓小平家中现在就挂有一幅《双猫图》。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另一只猫毛色乌黑。两只猫一前一后，缓缓向前，异常灵动，十分惹人喜爱。更有趣的是《双猫图》的上方，是几行题辞：“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落款处，端端正正地写道：“小平同志雅正海石老人”。

这海石老人叫陈莲涛，时年八十三，被民间誉为“江南猫王”。陈毅、荣毅仁、梅兰芳、姜妙秀都很欣赏他画的猫。并收藏了他的作品。

1984年，邓小平得知“江南猫王”仍健在，便托人捎信给“猫王”向他致意。陈莲涛得知邓小平在百忙中还记着自己这样一个普通老画师，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精心构思，一丝不苟，画了一幅《双猫图》，托人敬献给邓小平。邓小平的大女儿也是画家，看到《双猫图》后爱不释手，向父亲要这幅画，父亲当然不给。于是她托人请“猫王”再画一幅。“猫王”欣然作画，又画了一只活灵活现，可爱媚人的小花猫赠给她。

2. “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 死猪不怕滚水烫”

1976年春，一位省委领导同志在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后，去看望邓小平。这位领导同志向邓小平说：这次打招呼会议把批邓运动升了温。张春桥在会上明确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仅在文教界进行，厂矿，农村，部队都要开展。他还说，对你也可以在内部点名批判，看来他们这次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了。邓小平听了后淡然一笑说，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邓小平谈邓小平》第18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是句广为人知的俗语，邓小平用它来说明自己的为人真是生动，形象，风趣，诙谐。它准确地道出了邓小平乐观，豁达的胸怀；坚定、沉着的个性以及钢铁般的意志。

邓小平的一生经历过无数的波折和磨难，战争年代的惊险搏杀，血雨腥风；和平年代的党内斗争，政治风浪，几十年来他坎坷不断，命运多艰。然而，无论多么大的风浪，多么大的波折，邓小平始终能够做到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始终能够沉着，冷静，坚韧不拔。这种罕见的坚定性是令世人钦佩的，这正是一个伟人的力量所在。而“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则是这种品质的最准确，最生动的说法。

3. 做事坦荡荡，说话坦荡荡

邓小平口才中有一个重大的特点，那就是讲真话，讲实话，用一句成语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这句话已成为邓小平做人的信条。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曾说过：“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

的确，邓小平从参加革命至今，一生奉行实事求是，从不弄虚作假，做人，说话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

邓小平自己就说过：“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

1961年8月，邓小平来到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在庐疗总院267号小别墅，卓琳收拾好文件，轻轻关上门，在邓小平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若有所思地问：“老邓，我有些心里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

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卓林的内心想法，直率地说：“你不问，我也知道你要对我讲什么，你心有余悸，怕我这个邓老总走彭老总的老路，戴帽子挨批，是不是。”

卓琳关切地说：“前车可鉴。五九年那次庐山会议，张闻天没有听夫人刘英的劝告，他搞外交工作却在会上大谈经济工作，讲了真话，结果挨了批判。彭老总等人也戴上了右倾的帽子。这一次，你讲话也不要太直率了，别也戴上帽子回北京。”

邓小平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风趣盎然地说：“那一次，听说有的人口袋里装着两篇讲话稿来庐山，一篇准备彭德怀得势时用，一篇准备在毛主席得胜时用。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共产党人就是要讲真话，我该说的还要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

卓琳怔了一下：“情况虽然完全是这样的，但你在会上不要说得那么重嘛。”

邓小平郑重其事地说：“正因为问题严重，所以说重一些，好引起全党的重视。不过，我是真诚地为毛主席补台，而不是拆台。”

卓琳知道邓小平直率、真诚，刚中有柔，毛主席是相信他的，也就没有多劝了，只是不无担忧地说：“你看着行事吧。”

邓小平口才中这种说实话、说真话的例子相当多。也正因为爱讲实话、真话的性格，才导致他的“三起三落”。

然而，邓小平是一位有着坚强心灵的硬汉，一位绝不向“左”倾错误路线低头的硬汉。他的确堪称做事坦荡荡，说话坦荡荡的真君子。

4. “比如坐小汽车去看电影，就要出点钱”

毛泽东曾说过“为人民服务”这一类充满人生哲理的话语，如“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等等金玉良言。

然而邓小平谈类似的话时，也非常朴实，具体，给人一种心贴心的感觉。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一篇十分重要的讲话《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说了许多看似普通，却十分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可以从他的平常心中见出一种极高的境界。

邓小平为我们这样道来：

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实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会带来很多好处，首先官僚主义自然而然会减少一些。当然，我们的生活会没有过去那么舒服，但比一般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是不知要好多少。有时也会有些不方便，比如坐小汽车去看电影，就要出点钱。你不愿意花那个钱，不看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邓小平提倡高级干部去看电影，坐小汽车也得付费，如不付就“不看就是了”，从这件小事可见他廉洁的作风。

他在谈到“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时，还说道：

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很多同志根本不去同群众接触，一个学校的负责人，不去跟学生谈话，甚至于跟教员都不大接触。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对群众的饮食起居关心到这种程度（在厨房、厕所、洗澡间都要细细看过），可见邓小平爱民如子的高尚情怀。

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要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同群众商量办事，共同克服困难。有的学校学生提出生活问题，说厨房没有人管，菠菜就切这么一下，连沙子都煮到锅里面去了。你切细一点，把沙子淘干净，这总可以办得到吧，这并不增加经费。可是，工作不深入，不跟群众接近，不跟下面干部接近，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发生的许多问题，有许多群众上访，往往是由于我们工作跟不上，没有做好工作引起的。当然，上访人员里边的一些坏人搞违法乱纪的事，那就不能说是我们的工作问题了。

连学校食堂的菠菜应该淘干净这么细微的事情邓小平都能注意到，这是真正的平常中的伟大。他的心与广大的人民是息息相通的，而绝不是高高在上的。

这样的高风亮节，这样的口才无不令人叹佩不已！

5.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在许多场合都讲过这样的话：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工作，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包括纠正不正之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看起来讲得很普通，很平常，但却在通俗与直白之中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它要求人们全面地观察，全面地分析和全面地处理问题，不能搞片面性，绝对化，不能顾此失彼。

邓小平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辩证法著作，但他的谈吐中无不充满了辩证的哲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要求我们以辩证的观点来处理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的耳边经常听到这句话，它以最浅显的方式告诉了我们无数深刻的道理。

6. 小小年纪出语不凡

在《邓小平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放学的路上，邓小平碰到一个同学在哭泣，他和其他同学急忙围上去询问原因。这位同学流着眼泪边哭边说，妹妹病重，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如果没有医生的治疗，妹妹可能会死的。有的同学急忙建议说：“那快去请医生呀！”听到这话，那位同学哭得更伤心了。邓小平知道这位同学家境很贫寒，是没有能力拿出一大笔钱去请医生的。怎么办？他一路思索着，盘算着，默默地走向自己的家。

第二天一早，邓小平还没有走进教室，就跑到那位同学身边，悄悄地塞给他5个银元，嘱咐他拿去给妹妹治病。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买500斤稻谷，是邓小平从父亲那里“偷”出来的。这是为了帮助别人。否则，他是无论如何不肯做这样的事的。

几天后，父亲发觉丢了钱，这是家里从未发生过的事，他非常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查问，邓小平不等父亲发问就主动站了出来，承认钱是自己拿的，并递给盛怒的父亲一根棍子。在接受父亲一顿打之后，邓小平含泪离去。当父亲怒气稍稍平息之后，开始感到困惑不解，这娃儿平时节俭得很，连给他的零用钱都舍不得花，有时妈妈给他的钱还不要，怎么突然偷走这么多的钱呢？莫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试探性地向儿子提出这个疑问，儿子告诉他，自己朋友的妹妹就要病死了，却无钱就医，在家等死……未等邓小平把话说完，邓绍昌便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连连称赞儿子做得对，然而，邓绍昌还想知道，为什么儿子受到惩罚时一声不吭，也不替自己申辩呢？儿子回答说：不管为什么，随便拿家里的钱是不对的，挨打受罚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为什么哭，那是因为他不能挣钱救济别人，感到羞愧。

“为自己不能挣钱救济别人感到羞愧”这句话讲得多么好啊！它反映了少年时代的邓小平至善至美的心灵，同时也显示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这句看似寻常普通的话，却非一般寻常之人能够讲得出的，没有慈悲侠义的心肠，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胸怀，这句感人的良言便难以出口。

8. 我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 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邓小平从年轻时就喜欢游泳，并养成了冷水浴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间断过。到了 70 岁的高龄以后，邓小平仍然坚持游泳。差不多每个夏天，他都要去北戴河、渤海或黄海劈波斩浪。

1983 年夏天，邓小平已接近 80 高龄了，但他仍十分喜欢游泳。他在东北和华北一些地区视察之后，来到了黄海之滨的棒槌岛。在棒槌岛的 7 天时间里，除了一天因海上漂浮油污而没有下海外，他每天都去大海中畅游。

1989 年 9 月 1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开门见山就说到了游泳，他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讲这番话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是位高龄老人了，然而，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却看不到丝毫垂暮的气息，看到的只是一种壮心不已的朝气。邓小平说他不仅喜欢游泳，而且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说这样自由度大些，有股气势，这反映了一种顽强可贵的精神，一种难得的生命活力。这种看似普通的话语从一位老人口中说出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东西，一种伟大的风范。

8. 植树节快到了，我们家今年 每人至少要栽 3 棵树

1981 年夏天，四川，陕西等地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水灾，长江、黄河上游发生了特大洪峰，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水灾发生后，邓小平同志惦记着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9 月，他特地找到万里同志说，最近的洪灾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木材的过量采伐。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中国公民，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株树，比如三至五株，包栽包活，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法。

10 月 19 日和 11 月 9 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植树造林的谈话精神，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并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决议（草案）。12 月 13 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在法律上为每个适龄公民规定了每年植树 3 至 5 株的义务。

邓小平同志是义务植树的倡导者，也是义务植树的积极实践者。每年植树季节，他都要拿起工具，参加到植树造林的行列，去履行一个普遍公民的义务。人大决议实施的第一年——1982 年植树节的前两天，百忙中的小平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植树节快到了，我们家今年每人至少栽 3 棵树，要包种包活。3 月 12 日那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小平同志带领家人前来植树。他精神饱满，种了一棵又一棵。旁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不累。一人栽三棵到五棵，我们要完成任务。”

小平同志的行动，是无声的号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青少年都纷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这个造福人类、荫及子孙的绿色浪潮席卷华夏大地。那一年，全国有近 2 亿人参加义务植树，种树 10 亿株。1983 年 3 月 12 日，邓小平在北京十三陵植树时又讲了一番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话，邓小平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讲的也是造福子孙后代。邓小平的确对生命有一种美好的憧憬，具有一种人生的大境界。他讲的这番植树的话正好反映出他内心的这种境界。他不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沉湎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的伤怀之中，而是充满朝气，依然是壮心不已。

9. “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邓小平对中曾根谈了“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的观点，在此他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与大外交家的风范。他热情地要求日本来我国投资，共同开发，共同合作。

接着，邓小平转了一个话头，以平常心的大境界回答了中曾根提出的一个十分精彩的问题。中曾根问：“你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

邓小平娓娓道出了他心中的欢乐和痛苦。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因据邓小平女儿毛毛的回忆：“我的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

而这一次，邓小平却对中曾根敞开了心扉，由此可见他的真诚以及他对中日友好的殷切期望。

邓小平说：

谈到我个人的经历，你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览室里看到的那张有我在里面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时只有十九岁。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从这节谈话中，我们足以感到邓小平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它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如以佛家的话来说，一个人的至高境界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愁。”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个人，心中装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一心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正是因为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才使他度过了各种艰难险阻。

10. “人总是要死的”

“我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老战士见面总是愉快的。我们要把经历过的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期忘掉，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

邓小平以这段非常富有人生意味的开场白展开了他那充满哲思的论述。这一天是1988年9月5日，当时他正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论中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邓小平如一个充满智慧的时间老人一样，满怀深情、感怀以及热烈的憧憬对胡萨克说：

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1922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坏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1954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1921年建党到1957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你看过我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这表明，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坚持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我们相信，现行方针政策一定会继续下去。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一点有信心，也感到愉快。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我，搞我的什么传，我都婉拒了。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

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 1997 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 。

12. 要言妙道：大与小的辩证法

1984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说过一番十分精辟的话，其中充满哲理，给人大有启发。

邓小平说：

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我们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犹如一个事物有“大”（可引申为“好”）的一面，也有“小”（可引申为缺点）的一面；一个国家亦如此。邓小平以他精到的辩证法为加尧姆说清楚了中国的形像。它既是大国，又是小国。

正因为认清了这一点，邓小平才心里有数，也正如古代兵家所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怠”。

接着邓小平又对客人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从谈吐间，我们可以感到邓小平坚定的信心以及美好而实在的憧憬。

他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地大的人多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我们建国三十五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大的。但是中间经过一些波折，耽误了一些时间。最大的波折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波折，中国的面貌肯定不一样了。最近六年来，我们改变了过去一些“左”的政策。现在我们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六年中，我们取得的成就超过了预想。看来，我们确定的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八百美元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是热爱和平的。

